
國際線
International Front
Vol.4
2021 DEC
如水
Flow HK

如水

flow HK

國際線

International Front

編者的話：
在我心中唱還是昨日少年歌



文 / 馮敬恩

一日，海外港人飯聚，問了我一個錐心的問題：你對香港的關懷，是出於對香港的感情，還是對於公義的追求？我一時語塞，心中暗忖：究竟是哪一樣？

離港三年，先後在兩間美國上市公司工作，掙扎求存。正當我在海外產生獨特的當地認同之際，腦海中隆隆想起陳之藩在《旅美小簡》中所言「我曾驕傲的說過自己：『我，到處可以為家。』，我問自己：真的是這樣嗎？在這場自我放逐過程中歷經反送中運動、《國安法》以及無數舊友逃亡海外，心中總是念茲在茲。即便在滿足生物邏輯層後，我默默地為港人貢獻自己一分微薄的力量，但是仍然處於失根、失語的狀態。我想這就是鄉愁。去年年底，致力草創《如水》的總編輯Sunny致電正在食茶餐廳的我，說明想要籌辦雜誌，為在地港人發聲。我們都已經是老朋友了，他每次找我準沒有「好」事情。可是，我思慮良久，終於決定加入。《如水》雜誌所探討的海外港人群體，以及以學術角度探討他們如何在海外協助在地港人，正是我希望力所能及的貢獻之一。對香港的感情，果然還是更勝一籌。

本期《如水》雜誌內容豐富，意味深遠。首先，封面是一隻隻水母。水母遍佈全球不同水域，在深海和淺海都能看見牠們的身影，當中的燈塔水母更加可以超脫生死，在水中重生。香港人當然比水母聰明，但是水母的韌性、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以及能不斷重生的精神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在文章方面，有《如水》編輯千八女鬼和鍾燊豪的篇章，題為《如何留得住高潮？新海外組織的危與機》，訪問了三個位處北美海外港人組織，了解他們成立的緣起和挑戰。當中不但有因反送中而成立的安港學盟，還有在昔日八九民運後成立的洛杉磯香港論壇。在過去八九民運時期，支持民主的中國人在海外組織如雨後春筍，可是隨著中國在地的反抗運動逐漸冷卻，這些海外組織迅速「收皮」，如今還在積極運作的寥寥無幾。反觀中國海外的「僑胞」組織，在中宣部、統戰部以及僑務部的長年努力下，在關鍵時刻往往能「代表」海外中國臣民發表支持中國的聲音繼而產生影響。正所謂「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海外港人的前輩和後進的經驗總結會為海外香港民主運動帶來深刻的洞見。

除了人際關係和資源等挑戰外，意識型態之爭也是海外組織分裂並同室操戈的原因。我個人而言，也曾因閱讀到海外港人撰寫但是立場左傾的英文文章而大動肝火，久久不能釋懷。在《國際線與跨族群連結》一文中，六月和式訪問了五個堅定支持人權和民主等價值，但意識型態略有迥異的海外港人組織，探討他們對民主中國、左翼與國際關係以及其他受壓迫的群體的想法和上述各種因素之間的互動，值得我們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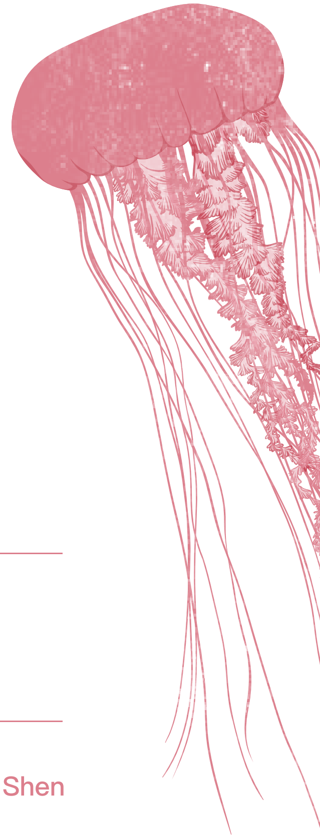
另外，海外港人組織其實遠比一般人想像的多元化，無遠弗屆。除了位處主流歐美大國的組織積極從事海外遊說行動外，其實在一些「不顯眼」之地還有一群港人默默努力。六月和言在《未受矚目的「國際戰線」》的訪問中，訪問了身在挪威和日本港人組織，了解他們在這些非國際游遊說中的「主流」國家如何持續關心香港，以及連結海外港人。他們在這些國家積極地關心香港，果效或未如政治明星在大國中的遊說工作。可是，正正因為這些海外港人的默默耕耘，致使香港的聲音被聽見，真正的「遍地開花。當然除了遊說的工作外，手足在海外安頓的事宜也十分重要。在訪問的第二部分，編輯們訪問了名為「住家飯」的英國組織，探討海外港人互助的工作。

正如英國十六世紀詩人所言：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王夏愈以《奶茶聯盟是國際連結的新範式嗎？》探討民間外交聯盟的傳播方式，並且總結奶茶聯盟的經驗，套入菁英VS 庶民參政的框架，鞭撻現存的國際組織的不足，以及在尋求國際支援不果後，這些受壓迫的反抗共同體所採取的進路。

在邀稿方面，我們有沈旭暉教授的《超越「想像的共同體」十點前瞻》，預測海外港人的進路，究竟是融入當地，全盤西化，還是「唐人街化」，自己「埋堆」，然後渡餘此生？沈旭暉教授提出了他的預測。同時，我們也邀請了前台灣學運領袖（估計他應該很厭倦這個稱呼）兼負笈美國的博士研究生陳為廷同學為我們剖析他在美國的觀察，並且透過書目《大國攤牌》（Superpower Showdown）為我們分析拜登政府如何處理美中貿易戰。

本期內容豐富，未能盡錄。書寫是我們的出口，惟其如此，才能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的家，以及對香港盡一分綿力。韌性（resilience）、行動力（action）、執念（conviction）以及情感（affection) 將支撐我們繼續寫下去。

國際線
International Front



文章目錄

●編者的話

●大時代

06 超越「想像的共同體」十點前瞻：
香港人到了海外，如何一起走下去？ —— 作者 Simon Shen

14 奶茶聯盟是國際連結的新範式嗎？—— 作者 王夏愈

●國際線面面觀

26 如水論壇 – 國際線 —— 作者 Sunny、Ray

40 如何留得住高潮？新海外組織的危與機 —— 作者 千八女鬼、鍾燊豪

52 國際線與跨族群連結 —— 作者 式、六月

68 未受矚目的「國際戰線」 —— 作者 言、六月

●讀者投稿

88 皮靴 —— 作者 任荷仁

●書評

90 拜登政府如何處置美中貿易戰？：
《大國攤牌》（Superpower Showdown）提供的幾點參照 —— 作者 陳為廷

大時代

超越「想像的共同體」十點前瞻：

香港人到了海外，如何一起走下去？



作者 | Simon Shen


Source：作者提供

隨著越來越多香港人到了海外，如何把我們的共同體凝聚下去，既是挑戰，也是使命。這一波移民潮之前，海外香港人和後裔估計已經有百多萬人，單是加拿大就有六十多萬，估計十年後，海外香港人群體的總人數可能達三百萬人。海外香港人社群的性質和海外中國社群不同，沒有血緣主導的排他性包袱，而是核心價值先行，比較容易吸納各地同路人認同和加入。世上不少高度發展的小國如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等，人口也不過一、二百萬人，而海外港人的經濟狀況比敘利亞、阿富汗等外僑好得多，這樣的經濟體，早就達到小康之國的規模。話雖如此，具體上應該如何走下去，卻是知易行難。近來和不同朋友腦力激盪，簡單概括出十點，純粹拋磚引玉：

1.當「黃色經濟圈」的概念走向全球化，並與各地的日常生活結合，產品和服務會更見多元，而且互助性質更明顯。香港人四散各地，不少是以投資移民方式定居，他們經營的小生意，像餐廳、書店、酒吧等，會互相成為彼此的上下流，慢慢結成生態體系，再參與到各地社區當中。這比過去兩年香港黃店高度集中在餐飲業要來得更系統性、更成熟，因為一切是依自然需求發生的，而不單是理念先行。這樣由出入口、餐飲到服務、外送再到整合資訊的app，都可以各自分工。像台灣香港協會製作「同島一念，撐港小店」地圖，列出台北黃店清單，或像居英港人組織「暖氣軍師撐香港」推出英國版黃藍地圖，標示支持和反對抗爭的商店，都是經濟圈擴展的明例。

2.經濟圈要成為「圈」，不能止於單純的經濟買賣、也不能止於縱向有上下線，更應有橫向發展，才能健全生態圈的基礎。例如台北的九月茶餐廳，除了提供飲食、支援香港，亦建立在地連結，在疫情時送便當到醫院，這種連繫港台社會的功能，自然會進一步延伸到台灣的本地產業鏈。又如海外香港人品牌「Project R」，以香港設計、台灣製造和全球銷售為手法，希望成為全球香港人社區的力量，概念就是打破地域限制，而同時串連地域。另一些企業，則專門為香港人建立全球支援網絡，如就業、創業、升學、培訓等，以「互助、互補、共存、共生」的心態，凝聚世界各地香港人，向世界宣揚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和形象之餘，也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

3.屬於香港人自己的文化圈，亦會開始在海外成型。現在為數不少的香港文化人，都因不接受政治低氣壓限制創作題材，決意移居自由國度，這其實是突破大台、金主由上對下關係的難得契機。像杜汶澤的channel，足以以比TVB低得多的成本，取代其大部分娛樂功能，又像趙羅尼、黃秋生、顧定軒等人，希望以眾籌形式拍攝電影，都很符合香港目前由下至上、「無大台」支持產業經營的傾向。做法會否成功雖然有待觀察，但至少是繞過一條辮的監督機制，路往往是這樣行出來的。

4.媒體方面，不少經營網絡媒體的香港創作人、文化人、傳媒工作者，都因為擔心國安法以言入罪，或刪去Channel、Facebook page、IG，或宣布移居海外。當《蘋果日報》也被逼結束，壹傳媒工會聲明「即將化整為零，換個方式與大家同行」，一切已經遍地開花，海外的角色就更重要。像《蘋果》體育版團隊成立了自己的新平台《體壹》，《壹週刊》娛樂組、《蘋果》娛樂和《青雲路》的員工成立了《娛壹》，《米紙》專談社區、人物和飲食等故事，還有「餓底TV」、「味來見」、「世界仔 World One」、「Five Dots 寵物攝影」等，都是取代傳統大台的新媒體潮流。不過長此下去，當這些小品牌也遇到打壓，還可以怎樣？在海外繼承道統，反饋香港資訊，就會順理成章。



Source : 作者提供

5. 教育是「新香港」重災區，也是不少家長決心移民的主因。隨著直播、錄播的課程技術愈來愈容易取得，受眾也遠比先之前可及，網絡教學變得普遍，海外香港人建立虛擬學院，繼續實踐昔日真正的教育理念，也變得指日可待。就算暫時未能成立一所實體的香港學院，仍可以透過網上資訊科技的平台，讓重要的見解傳播至全球。事實上，許多文化人都已經在做著這樣的教學，如哲學、歷史、文藝等，只是沒有統一的課程而已。昔日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不正是如此土法煉鋼，反而激發了無窮生命力？21 世紀的「新中大」，也許正是由海外港人在網上建立自己的 Khan Academy、Coursera 開始。

6. 在傳承香港、定義香港這話語權層面，移居海外的香港學者的角色，也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他們肩負著重新講述香港都會、歷史的真相的重任，也對抗中國、「新香港」政府對「香港人」的政治正確、扁平、片面詮釋。香港研究本來並非學界顯學，但現在卻正是香港學發光發熱之時，因為「香港」已經不只是地理名詞，也變成了全球守護民主自由核心價值的前線，日後研究香港的國際學術工作，也將倍增，反而在「新香港」研究香港、發表有關文章，卻已變得高度敏感。此消彼長，研究在哪種土壤才能開花結果，誰不知道？

7.「學術」並非只是學者的遊戲，而是連結到學生層面的組織網絡，才能教學相長的。當香港連學生組織也要瓦解，世界各地來自美、英、加、澳、日等國共計四十多所大學的香港海外留學生，即成立了「自由香港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Hong Kong），這都是歷史傳承的另一部分。學者著書立說，文藝創作者書寫故事，海外香港學生自發舉辦活動、展覽，如抗爭運動時各地院校可見的連儂牆，這些都是話語權爭奪中的的典型分工。

8. 海外香港人要長期鞏固身份，教育與文化推廣至為關鍵。近年中國積極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輸出簡體字、普通話教育，但其文化滲透及其極權意識形態的宣傳，已經備受各國批評。香港人若要在海外建立更為厚實的文化圈，不妨可以思考成立有實無名的香港學院，教授粵語、繁體字、香港文化、非中國獨尊的華夏論述等，除了能為香港海外移民子女提供本土教育，也可以吸引對香港有興趣的外國人來了解香港，成為一所重要的文化基地。事實上，海外學習華語、東亞文化需求甚殷，但對中國已經充滿警惕，假如海外港人能打入這市場，或與台灣、其他海外友好合作，甚至一舉取代孔子學院的市場佔有率，無論在哪一個層面，都可說是潛能無限。



Source : 作者提供

9. 新的科技概念，能夠令我們思考海外香港文化圈、經濟圈時，產生更多啟發和可能。例如高重建主張倡導「區塊鏈」應用，推行「貨幣抗爭」，使用密碼貨幣錢包，如同中立的離岸戶口，具有高度的私隱安全。當香港電台影片宣布陸續下架，即有網民自發 backup，為了安全，更把 1973 年以來六千多段港台影片，永存於區塊鏈，超越了傳統寄居某一大台的想法。新一代愈來愈能發現區塊鏈的重要，也開始漸漸熟悉其中運作，保障未來的出版自由及貨幣應用。這將會是未來一項重要的技術，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和實踐。

10. 香港海外生態圈，有了資訊科技，不需要效法唐人街的排他性群居，也自然會出現包容性的虛擬 Hong Kong Town。如果有實體空間，延續屬於香港人的生活圈，這自然是一個實質的經濟體；但就算是由網絡連結，這也同樣是一個非常實在的經濟體，對將來下一代繼續承傳香港文化、核心價值等，有長遠的助力。如此虛實相間，才能突破上一代人「唐人街化」或「全盤西化」的一邊倒傾向，能夠既捍衛自身身份認同、又同時積極融入各地社區，令香港人不會因為香港失陷、大陸政府盡全力同化而消失於天地間，反而能長存於世界。

相信無論香港人是去是留、是藍是黃，最後這一點，都是共同願望。



Source : JoelFulgencio_on_Unplash

大時代

奶茶聯盟是國際連結的新範式嗎？



作 者 ｜ 王 夏 愈

我們去連結其他民主運動，是為了達到什麼目標？

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ance）是非主流的跨國行動者網絡。除了廣義的民主、多元價值、反威權體制、及初期反中國霸權的情緒外，奶茶聯盟沒有清晰的政治議程，它亦未如一些國際環保或人道組織，各持份者有資金上的從屬關係。由 2020 年 4 月奶茶聯盟成形以來，筆者一直都很疑惑，究竟什麼是奶茶聯盟的黏合劑，令這個既沒有大台、身份混雜、沒有組織層級架構、沒有實際政治權力的東西，繼續成為年輕東亞／東南亞行動者連結的空間？在過去的十六個月，奶茶聯盟這個符號不單沒有過時，反而有更多國家的行動者加入。我們會直覺認為，政治能量和效益，是任何政治聯盟的黏合劑，沒有這些工具價值，聯盟則會瓦解。這篇文章會嘗試解釋，奶茶聯盟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其實沒有太多的政治能量和效益，但由於現有的國際秩序也面對認受性危機，反而滋潤了奶茶聯盟這種草根國際聯盟。

我記得許多年前，小學常識科教科書是這樣描述香港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中央負責管軍事和外交，特區政府享有其他權力。」這個描述的潛台詞是，「軍事」和「外交」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行為，普通人在這兩件事情上是沒有角色的。事實上，不只是中國這類專制國家才會壟斷外交政策，我們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聯合國、國際金融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是以國家作為單位，非政府組織（NGO）及學者只擔當著諮詢的角色，決策上還是要靠每個國家一票決定。貿易原則、多邊協議如上海合作組織、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這類經濟協議，也是用國家作為單位去影響彼此的農業補貼和貿易壁壘，甚至連制定國際勞工條約的代表團，都是由政府委派。[1] 雖然國際組織總把「容納」民間聲音掛在口邊，實際行使權力時，又是另一套嘴臉。

任何的民間國際連結，都不得不在這套國際秩序中遊走和尋找空間。遊說有權力的政客和國際機構，就成為很多民間團體的主要策略。很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會選擇專業化的路線，高薪聘請熟悉國際法的律師、研究員和說客，在國際組織的體制內與各國職業外交官打交道，或發佈長篇大論的倡議報告，嘗試影響他們投票的意向。商界則通過扶植智庫、大型經貿論壇，增強政商界間的合作共謀。沒有資源的移民群體，會跟非政府組織合作遊說外交官和政界，聚居在民主國家的離散群體，亦可以善用族群身份政治，用選票來影響政策結果。

1. 香港在 2021 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工人代表是鄧家彪，而中國的工人代表則來自中共直接控制的全國總工會。



Source : KitthitornChaiyuthapoom_on_unplash

在這套以遊說和金錢為主軸的國際政治秩序下，奶茶聯盟是先天地不擅長遊說這種策略的。海外團體在民主國家進行遊說時，面對的第一大挑戰，是代表性的問題：海外團體需要通過找運動中的名人加持，或通過組織離散社群，以人數向遊說對象顯示自己的代表性。第二大挑戰，是如何令訴求變得精準——通過一條法案、增加一萬個難民名額、制裁某個實體（entity）、甚至在Twitter上發帖子聲援。外交官、參議員這類政治精英公務繁重，愈複雜的訴求愈難明白，愈難明白的訴求就愈難得到支持。所以，離散社群通常都在運動內部，用相對時間解決內部分歧、建立共識，再向屬意的政治精英提出精準易明的訴求。

可是，奶茶聯盟偏偏是一個鬆散、由志願者維繫、沒有層級管理、亦沒有財力去籠絡政界的群體。奶茶聯盟的行動者來自五湖四海，只要認同民主多元價值的人，就能使用奶茶聯盟這個符號。要在這充滿語言障礙、文化歷史、政經脈絡截然不同的聯盟中，進行多輪的對話及建立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舉個例，今日的緬甸反抗運動中，以學生及工會為首的一派，傾向支持全面攬炒——要求各國政府和商界全面撤走在緬甸的投資，切斷軍政府的財政資源。然而，文人政府前議員、少數族裔和民間團體組成的全國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則傾向有限度的經濟制裁，盡量減低制裁對平民生計的影響。兩派都各自遊說國際組織和政府。在類似的立場和訴求上，奶茶聯盟是很難選邊站的。奶茶聯盟的積極參與者，例如不同國家的推特管理員，雖然有互相溝通合作，但大體上都是獨立運作，按自己的時間和志趣參與討論。當每次的討論都有人加入、退出、異議、提出新意見的時候，很難得出精準的訴求，並以此作為基礎跟政治精英進行遊說。

奶茶聯盟不擅長遊說，亦沒有金錢去購買影響力。有很多扶貧和義教的國際網絡，都是用「撥款－做項目－吸引受助國政府參與項目－下一輪撥款」的方式來維持合作關係及製造政治影響力。而國家則多以金錢外援（Foreign Aid）和債務減免來影響他國政治和公民社會。[2]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減免希臘的債務時，就迫使希臘政府重新設計退休保障制度、減少社會保障的支出，或調整其稅率增加收入等。奶茶聯盟的行動者掌握的社經資源本身就很少，較成功的資源共享例子，已經是台灣的行動者輸送防具給香港和泰國的抗爭者。在緬甸政變初期，軍方曾間歇性封鎖網絡，便有行動者發起偷運電話數據卡的行動，或替身陷險境的緬甸人在海外增值電話卡，讓他們可以跟外界保持聯繫。然而，直接援助的門檻其實很高，尤其是當泰國的抗爭者最需要的是疫苗而非防具之時；當羅興亞人在邊界需要的是人道物資而非網絡數據卡的時候，奶茶聯盟可以發揮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因此，只有國家級的援助機構、大型的人道NGO、以及基金會等坐擁龐大財政資源的組織，才可以用金錢關係這套模式，跟受助國的公民團體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

2. 中國政府經常將這種外援行為抹黑成西方國家扶植代理人，和干預一國內政的行為。但事實上，Foreign Aid是所有大國都會使用的外交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政府的金援行為有時更顯得詭異，例如捐助莫桑比克的內政部、贈送物資給新聞機構、警察局，以遊學團和獎學金方式資助非洲國家的記者、婦女團體等等。



Source : NathanDumlao_on_unsplash



Source : JavierAllegueBarros_on_unplash

在常規的國際政治秩序下，奶茶聯盟這種劣於遊說，又沒有金錢影響力的跨國網絡，基本上是沒有吸引力的。但有趣的是，當常規的國際秩序面臨認受性危機時，反而讓草根行動者可以偏離原有的遊戲規則，來製造政治能力和影響力。

廣義而言，國際舞台沒有最高法官、沒有警察、更沒有上帝。這衍生出一個老問題，為什麼國家需要遵守國際規範和規則？如果有國家不守這些規定，又有誰可以擔當仲裁和執法者？至今國際關係理論亦未有（亦應該不會有）定案。有些人認為每個國家都是以自肥為最大目標，有些則認為國家會以國內的民意為依歸云云。筆者傾向的理論是：國際秩序本來無一物，是不同國家約定俗成的習慣累積出來——例如「任何國家都可以在公海範圍拘捕及扣留海盜船隻」這條規則，是源於十九世紀歐亞國家不明文的習慣，至 1958 各國簽訂《公海公約》後，才正式成為明文的國際規則。同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成員制以及否決權，亦源於一戰前國際聯盟的制度。而安理會的超然地位，亦延伸到國際刑事法庭的制度：國際刑事法庭只能處理《羅馬條約》締約國國內反人類罪行。國際刑事法庭如果要處理非締約國如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幾十個國家中發生的罪行，就需要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首肯。結果就是，違反國際人權規則得最嚴重的國家，要麼就不受規管，要麼就得到中國或俄羅斯撐腰，免受聯合國的懲處和介入。

有很多奶茶聯盟的行動者，都曾幻想過國際社會的介入，能夠為他們主持公道，阻止人權侵犯惡化。2019 年香港反送中示威初期，就有行動者在大型集會中，以多國語言朗讀宣言，表明爭取民主的訴求；行動者曾到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遊說，亦有人嘗試爭取國際法庭仲裁警察暴力的問題。一年前，泰國的示威者在世界人權日遊行到聯合國的分部辦公室，結果防暴警察用一重重水馬把聯合國辦公室圍起，驅散爭取釋放政治犯的示威者。在緬甸槍林彈雨的街頭，戴著建築頭盔、拿著油桶改裝成盾牌的示威者，盾牌上貼上“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國家保護責任），呼籲聯合國阻止軍政府的種族清洗和鎮壓。結果當然是不成功的，而這些挫敗的經驗令許多人對現行的國際規範和機制失去信心。有緬甸的抗爭者就在推特諷刺道：「聯合國你慢慢來吧，我們只是死了千多人，還有幾千萬的平民未被軍方殺害。」

民間社會對現存的國際機制信心大減，全球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升溫，亦在改寫二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以中國為首的威權陣營，已經佔據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近一半的席位，經常削弱譴責人權侵犯的議案，並利用數字上的優勢，阻止帶自由主義色彩的非政府組織（例如維基百科基金會）參與聯合國機構事務。雖然《世界人權宣言》九位的草擬人有中國的代表[3]，中國卻在近年大力推動西方人權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的論述，並嘗試將國家主權和不干預內政的原則寫入國際規則。結果就是，連長期接受聯合國和民主國家援助的埃塞俄比亞，都敢於驅逐聯合國官員，指控他們干預埃塞俄比亞對提格雷亞的戰爭。國際機制無法向民間保證好的政治結果，威權國家衝擊舊有的國際規範，維護舊秩序的政治精英再沒法壟斷外交這個遊戲。

舊有秩序動搖，為奶茶聯盟這類跨國網絡開了新的缺口。當遊說政治精英和職業外交官的效益遞減時，人們開始用其他方法去影響國際政治議程。奶茶聯盟支援緬甸民主運動的策略可粗略分成數類：將庶民的消息和意見擴大，搶佔議程制訂的權力；增強民間行動者的認受性，讓被精英政治排擠的民間團體可以進入輿論中心；發動行動針對非政界的目標，切斷例如油公司、通訊企業對軍政府的支持。

社交網絡令庶民更易挑戰政治精英的話語權——例如東盟的推特帳戶只有 14 萬追隨者，而奶茶聯盟（@AllianceMilkTea）、奶茶聯盟泰國、緬甸菲律賓和印尼合共的追隨者已經超過 14 萬這個數目。在推特上，抗爭者和公民記者都會在帖子上加上跟抗爭運動相關的hashtag，他們有不少人會把 #MilkTeaAlliance 排在主要的hashtag後，用以呼籲奶茶聯盟的行動者一起將消息炒熱，務求把現場第一手的見聞推上社交網絡熱門。

緬甸政變初期，聯合國依據既定原則，屬意東盟作為協商平台，跟緬軍討論停火和人道通道的問題。此舉當然惹來一片聲討，批評者指責東盟其餘九國同屬專制政府，他們只會包庇緬軍的行為。奶茶聯盟分別在四月和十月發表聲明，批評國際社會不應將緬甸的危機置於東盟處理，行動者亦以 #ShameonASEAN，挑戰東盟的認受性，促請各國承認緬甸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的合法地位。十月底，東盟高峰會決定不邀請緬甸軍政府的代表，象徵軍政府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狀態。

3. 中華民國的代表是哲學家、戲劇家張彭春，被譽為「中國人權之父」，歷史考據認為他在草擬《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將儒家「仁」的思想跟西方自由主義結合，寫成宣言第一條的「理性和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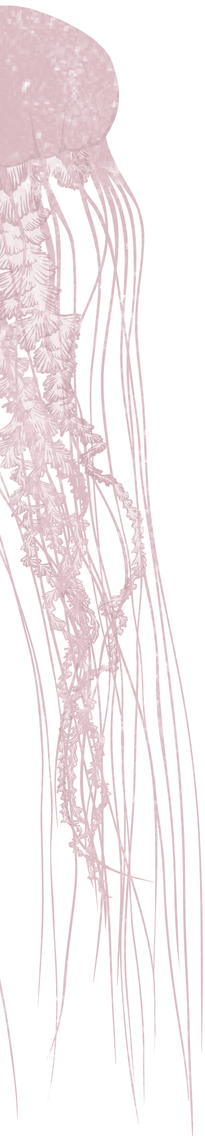
Source : 緬甸遊行

全球化模糊了傳統外交與「民間外交」的界線。外交不再限於接見外國使節、簽訂貿易條款、處理領土資源爭議、軍事競爭等由國家壟斷的遊戲。科技巨企、跨國公司的商業決定，有時更能在國際政治中泛起漣漪。這意味民間可以針對更多對象施壓，影響國際政治的形勢。奶茶聯盟的行動者就嘗試針對美國雪佛龍和法國道達爾兩家油公司，以杯葛、直接行動及線上聲討的方式，要求油公司停止將利潤存入軍政府的銀行戶口。行動者亦協助整理緬甸政府外洩的密件，揭露跟軍方高層合作的外資企業，甚至兩日之內，將整套香港示威者的抗爭手冊，翻譯成緬甸文供抗爭者參考。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曾以「開源運動」（Open Source Movement）形容2019 年的香港示威，他指出，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在去中心化的狀態下，以網絡聚首一堂，商討、合作、貢獻自己所長。同質的開源運動同樣在奶茶聯盟發生，在短時間有效地向多個目標施壓。民意巨浪搶奪了媒體的注意力，亦促使政治精英加快回應速度，應付突如其來的民意巨浪。歐盟在十個月內，對緬甸軍方及其屬下企業實施了三輪經濟制裁，並準備在年尾進行第四輪的制裁。這種制裁的頻率，是過往難以想像的。

去中心化的跨國運動，亦令以往在自己國家單打獨鬥的行動者，開發出新的戰術——例如泰國王室長期濫用「冒犯君主罪」（Lèse-majesté），以年計的牢獄來懲罰批評王室的異見者。這令泰國的示威者只能用「擦邊球」的方式在社交媒體批評王室。奶茶聯盟令泰國行動者可以跟國外的支持者合作上演裡應外合，國內的行動者先設定議題，再由國外的行動者製作尖酸刻薄、挖苦諷刺的meme圖，甚至組織行動者到泰皇下榻的德國酒店外，以投影機打出「把國王拉去坐牢」的圖像示威，突破泰國人長久不可侮辱王室的禁忌。

我們稍回到文首的引子：沒錯，國家和政府在法律上壟斷了「外交」這個領域，但事實上，每個國家對外的政治影響力，都因不同的原因被民間分薄了。奶茶聯盟的行動者，都在自己的國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但這個受打壓的共同體連結起來，竟然增強了彼此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既然沒聯合國、沒有一個議員代表、沒有國際大法官可以充當救星，就用群體的力量去組織杯葛、推動制裁、或摧毀某國某人的認受性等，去支援彼此的抗爭。這些手法未必百發百中必有成效，但行動與連結的過程，本身就是對行動者的充權，共同挑戰精英統治的舊秩序。





說了很多民間跨國運動可以如何幫助我們的抗爭，我最後想帶出一個問題：我們跟亞洲年輕民主運動行動者的連結，是否只有工具價值？如果跟他們連結沒有帶來政治效果，是否就不需要連結呢？我深信國際間的友誼，本身就充滿內在價值。社會運動內部存在張力和錯誤，需要反思、批判與和解，但我有不少時候，都不敢把這些張力擺上枱面，一來怕散播負面的情緒，二來怕增加運動內部的裂縫。國際的行動者友人在這個時候，就能夠成為最好的傾訴對象：由於大家都是社會運動中人，很容易就可以互相呼應彼此面對的困難；但由於大家都不在同一場（狹義）的運動，沒有重疊的利益與人事關係，所以都可以在平等與和平的狀態下解憂。沒有利害關係的對話，有時更可以點出彼此的盲點。



如水論壇●國際線

國際線面面觀



作 者 | **Sunny, Ray**



Source : Cloud

香港社會運動的組織模式在過去幾年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從過去的「大台」模式到一四年雨傘革命中出現「拆大台」的呼聲，再到一九年的「無大台」運動，這些變化都跟過去運動的發展脈絡、政治環境及新舊組織的興衰緊緊扣連。若要扼要地概括過去近十年抗爭運動組織模式的變化，或許沒有比「去中心化」更適合的形容詞。

然而，當流散海外的香港人試圖以同樣的模式去發展海外運動時，部分由「去中心化」所帶來的優勢便成為了新的侷限。

在欠缺一個國際流散港人組織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把各地港人的聲音整合，從而能夠在國際上把全球港人的訴求說明清楚？若欠缺一個有系統性的討論平台，當港人組織在某些議題上存有分歧，我們又如何避免出現分裂？若然，港人流散運動最終需要建立一個能夠連結各地港人的平台，這個平台又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以及如何組成？相反，若然選擇完全摒棄中心化的組織方式，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欠缺「大台」所衍生的問題？

正如我們的創刊宣言所指，《如水》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為海外港人提供一個平台，去討論香港旅群未來的發展。兩位《如水》編委Sunny張崑陽及Ray黃台仰提辦了一場Clubhouse 論壇，並邀請了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攬炒巴Finn劉祖迪、流亡美國的Frances許穎婷，及一位不願具名的流亡前線手足共同討論。



在討論國際線是否需要大型組織以作統籌之前，我們理應先了解一下現時在海外動員上出現了什麼問題。論壇當中黃台仰便問及劉祖廸在過去組織集會上，如 612 全球集會，有否存在什麼困難，並對全球性港人組織的看法。

Finn 表示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大台其實相當困難，因為很多人來自不同的光譜和背景，不同組織之間也會有不同的恩怨歷史，因此 Finn 認為在百多個組織之間要建立一個跨平台實在不太可行。

他再補充到上一次有大台的行動就是 2014 年的雨傘革命，而那次的經驗絕非良好，決策上亦會出現問題，所以前線充斥著反大台的聲音。但直到 2019 年，素人自發的行動也能夠保持某種默契，各自在每星期舉辦不同活動，撐起整個運動的精神。他承認無大台的形式絕對有其局限，例如在行動緊急應變和協調上不一定有對手那麼快速。

他擔心即使現存海外運動鬆散，但也不能夠貿貿然走回大台形式，否則只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去解釋現時海外運動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缺乏了香港這個地方作為一個「虛擬領袖」（virtual leader）團結眾人，因此令到海外的人失去了一些方向。他解釋道，一九年運動最熾熱的時候，海外運動的參與者很多時候是建基於香港所發生的事情，然後採取一種回應式的和協助式的行動，因此對海外的人來說香港整體就是那個領袖，而大家圍繞

著香港發生的事情去作行動也比較容易去團結眾人。問題是國安法之後，由於香港的街頭運動已經息微，海外的行動便缺乏了回應的對象。沒有了香港這個地方作為一個領袖，海外的人要怎樣走便存在了不少的分歧。

他用自己的自身經驗去解釋他怎樣面對這個難題。他表示在 2021 年 6 月的時候他協助舉辦的全球 612 流水再聚集會，他幫忙擔任一個協調的工作，聯繫全球幾十個不同團隊釐定主題和分享資訊。集會完成後，大家便各自回到自己所屬崗位和國家去進行自己的工作。Finn 特別推崇這種議題性的合作，因為這樣是比較有可能跟不同組織動員起來，一次性地集中推某些行動。

一次性行動的局限，四散，「然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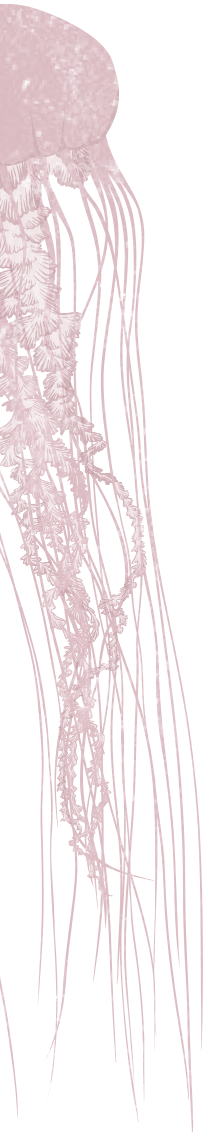
討論過程當中，大家再討論到這種模式會否有其局限。尤其議題式的合作很可能只能夠針對一些沒有什麼大爭議的事情，例如如果要舉辦周年活動紀念 6.9、6.12 這些日子，在海外便不可能有太大分歧關於怎樣舉辦，或者用怎樣的切入角度。這種行動可以被稱之為回顧式的行動，但問題卻出在另一種前瞻性的活動。

論壇隨即問及如果海外港人要討論一些政治理念和香港前途這些比較複雜的話題的時候，海外港人的多樣性便會呈現。那麼如果沒有一些大型的跨國組織作為平台讓大家討論，至少為了收窄分歧，這樣又有可能嗎？又或者，當政治人物離開香港漸久，想法上跟本地甚至海外群眾都不一定能夠接軌的時候，大家會擔心喪失代表性在國際社會面前進行倡議嗎？

Finn 指出他一直也在反思這個問題，甚至乎參考世界各地例如愛爾蘭、菲律賓、西藏及其他地方流亡活動的例子，不少人都有建立流亡政府、影子議會這些大型組織，可惜的是他認為失敗的例子居多。即使他認同代表性也是一個問題，但他直言短期內想不到有任何解決辦法，成立一個大型平台在海外也不一定能夠解決認受性的問題。

另一位嘉賓 Frances 又怎樣看呢？她用她自身在 2019 年的經驗指出當時大家在海外都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草根參與。每星期都有不同活動，亦都是很多人自發組織起來，才有一九年遍佈全球的運動。但兩年過後，海外不少人都陷入一種疲倦狀態，海外運動並沒有當初那麼蓬勃。因此，她認為像 Finn 那般所提倡的議題性合作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的確有機會陷入一種「搞完就完」的輪迴當中。





Frances擔心不少海外香港人會有一種出席了某些遊行就已經安心的狀態，然後就可以回歸日常正常生活，直至下一次又有一些遊行集會可以出席。在大家都疲倦，而且缺乏行動方向的狀態下，很多時候國際線的重擔便落在數位所謂國際線領袖身上。然後就由他們發板，其他人彷彿不用繼續思考未來前路。所以如何令香港海外運動的合作不只停留於一次性的議題合作至關重要。

然而，她不認為解決方案一定是要建立一個大台，畢竟其迫切性不一定大，而且在不同群體中應該還存在不少分歧，尤其是關於香港前途和國際局勢的形勢分析。

反之，她認為最優先可以處理的是要提供一個空間讓人可以理性溝通互相尊重，並從中重新鼓勵群眾去多點交流和溝通，培養更加多可以進行政治思考和工作的人。重要的是，這些平台的構建應該是更加的包容並兼，令到更加多草根、沒有社運背景的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反過來這種由下而上的長久的培訓、溝通和合作可能更好地解決，或至少回應海外國際線缺乏認受性的問題。有趣的是，Frances提出其實並非所有人都可以去做游說工作，因為游說本身有其門檻，不是簡單地因為你是美國人、是一位選民就可以約見議員。游說必定講求策略，但同一時間又要避免國際線過度精英主義，排擠他人參與。因此她補充，唯有這樣吸納多點人的意見和參與，才可以達到平衡並解決代表性的問題，令到國際社會看到我們的決定是有大眾參與和民意基礎的。

例如在美國情況，如果可以動員到美國不同州份和城市的香港人一起溝通，並促成某些行動，這樣的做法其實可以讓美國國會感受到到處都有香港人，看到香港人的力量，以及大家真的有代表性和能力去動員香港在美的群眾。

她再強調大台的組織性和高度中心化其實真的是一線之差，雖然她曾經反對大台的存在，但她並不本質反對大台，亦認為大台也好，平台也好，如果可以鼓勵由下而上參與，令到更多人可以互相尊重和交流，那麼這樣的機構其實是需要的。核心是不要讓這樣的架構排擠其他人而且必須要兼顧多元聲音。



Source : Cloud

許智峰則表示他看不到有迫切需要成立一個大台，但與其他人的理據不同。有趣的是，他反過來認為現時海外倡議上的分歧根本不大，不論大家光譜是什麼，大家都是集中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政府、希望外國政府盡快制定救生艇及避風港措施幫忙手足等等，因此他並不認為有太大的分歧需要去梳理。當然，他認為有渠道去作溝通是好事，但重心不一定要關於建立代表性的全球組織。相反沒有這些大型組織，在現階段可能還可以提供多點彈性給大家各自工作。

另一方面，他認為與其說要建立一個大型組織，他現時工作的重心反而是希望培養更加多有才能的海外香港人加入這場運動，並且用他自身過去多年從政及在公民社會組織不同行動的經驗，去分享給他人並陪伴在海外的香港公民社會成長。他認為現時在海外其實有很多很有才能的香港人，他們可能缺乏機會或者經驗，所以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幫助這些組織重整旗鼓，累積經驗，變得系統化和專業化，才能建立更加蓬勃的海外公民社會，令到海外運動得以壯大並持續地走下去。

他也反對國際線只是靠幾個人去擔當重任。他希望可以追求更加平衡的全民參與，有社會資本的人應該協助其他人建立不同的項目，及推廣香港人的故事。他亦強調根據他多年從政包括在立法會和民主黨內的經驗，他認為外國政客長遠除了因為人道原因幫助香港，亦都需要顧及更大的現實考慮。因此如果有一個擁有強大社會資本的香港公民社會出現在海外，能夠在當地社會建立影響力，便能夠更長遠說服海外政客幫助香港人。



至於另一位流亡英國的前線手足，則更加開宗明義批評其實大台這種想法還是有點語意不清。因為沒有人知道究竟不同派別之間所謂的實質分歧都是什麼，然後討論的東西又有多廣泛。例如我們只是討論政治上的綱領，還是涉及整個海外公民社會不同範疇例如文化、商會等的發展。在這些問題尚未梳理的情況下，根本難以討論大台的實際任務是什麼。同一時間，這位英國手足亦表示即使組織間有不同之處且有互相競爭的關係，有些時候不一定會有問題，反而可能對於海外公民社會更有利。正因為競爭，反而令到海外公民社會更加蓬勃起來，亦因如此可以變得更加有機化（organic）。跟Finn一樣他希望我們小心，不要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要因為現時出現了某些問題而馬上採用大台模式，走回頭路。

直至目前為止，感覺上可能不少嘉賓講者都是對於大台有質疑，感覺上更加偏重可行性的層面來討論。因此，主持黃台仰便回應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原則上現時的時空跟過去根本不一樣。首先，即使是以前雨傘革命時期反大台的時候，大家都只是反對一種由上而下的策略模式，而不是反對組織本身類似變成無政府主義者。只要決策是包括了更加多人，根本就沒有太大問題。撇除這點，Ray提醒一九年這個運動令到香港社會呈現了完全不一樣的變化，左膠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左膠，泛民也不是傳統的泛民，所以不應該用以前的視野來放大不同陣營之間的衝突和作出大家必定很難相處的判斷。



Source : Cloud

再者，在回應上述發言嘉賓的時候，Ray指出無大台運動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更為精細（subtle）的結構和機制。他以生物學上對有機體（organism）的定義[1]作為基礎，將無大台運動比擬為一種自我組織的系統（self-organising system）。

他認為所謂的自發和有機（organic）運動，其實都是在某些必要條件下才能出現（emerge）。Ray補充兩點，首先任何有機體都必然有一個清晰的邊界，隨之而來就是有對其邊界定義的機制。若然套用在運動上，運動的邊界決定於什麼原素以及誰人是運動的一部分。例如大家怎樣理解手足，怎樣理解和勇不分和抗爭訴求，其實就是構成整個有機體邊界的基礎。第二，在一個有機的共同體中，各個組成部份之間必然存著一個相互連結的網絡（interconnected network），就如各個公民社會的團體或者以組織作出的連結和溝通。缺乏這種網絡，各部份便未能夠協調並共同劃下邊界，而有機體便未能出現。

在國安法後，過去我們很多時候倚賴通訊網絡和社交平台作出公眾討論的空間已經不復存在，而如果缺乏這樣的組織或者空間的情況長期出現，那麼社會網絡便難以形成。沒有這種群體網絡，大家就更難成為有機體，彼此壯大並集體行動。與此同時，現時在外地的港人團體亦缺乏了一個穩健成熟的網絡連結彼此。正因如此，Ray 認為一個國際性的港人組織對於整場港人流散運動有其必要性。

1.Maturana, H. and Varela, F., 1980.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Dordrecht: D. Reidel.



Source : Cloud


MEMORIAL CEREMONY

在論壇的最後，雖然沒有共識可以達成，但感受到大部份講者本身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反對大台原則上的問題，但普遍認為時間上或者執行上存在困難，就如Finn最後都表示其實最大問題只是現階段很難「越級挑戰」，尤其當現時太多組織，亦都不容易溝通。反而如果幾年後，靜待一些組織消亡，那麼留下來的組織其實更有本錢去溝通和合作，那麼到時候再有一些跨國的合作也是可能。

另一方面，今次討論固然可惜未能夠集中討論曾經蜻蜓點水涉及過的其他海外社群組織的形態。無論是維吾爾大會、西藏流亡政府還是世界猶太人大會，當中他們不少都是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代表，那麼這種做法是否真的可以幫助他們在世界得到認同？得到認同又代表他們是否能夠更加有效甚至獲取更加多的資源分配給其他屬下組織，令到海外運動蓬勃起來？當然這裏要區分兩點，就是即使外國政府相當喜歡和承認這些組織的存在，也不代表明天就可以幫助那個國家光復起來。例如美國政府向來相當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亦不懼怕跟世界維吾爾大會溝通，但基於現實情況，當然沒有辦法在短期內完全幫助他們回到自己的祖地之上。儘管如此，香港人能否從這些組織學習更多經驗？

至於這些組織的存在又是否一定要處理政治議題呢？還是可以像講者所提及，應該透過協調，甚至是一些政治領袖的帶領，帶出更多的想像給予香港海外社群，來發展海外香港的文化和商業活動，策略性地壯大香港運動？



Source :Cloud

這裏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或許就像《如水》另一位編輯梁繼平在最後的發言一樣，可能最後是一個先後問題，而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假如不同國家內部的組織已經發展成熟，例如美國東岸組織已經成熟起來，那麼下一步就即刻可能是東西兩岸合作，然後甚至跟北美一起合作，壯大整個社群，分享經驗，才能令香港人的聲音和力量遍佈全球。情況就有點像台灣人在過去發展海外運動的時候，亦都是從不同國家先制定基礎，然後逐漸發展出全美台灣同鄉會、歐洲台灣同鄉會及世界台灣同鄉會這些不同地域和跨地域的組織，最終令到台灣海外運動成為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例子。誠然，每個國家的例子和狀況都不盡相同，所以香港人的未來絕對值得我們再三思索。但是肯定的是，不同人和組織之間的溝通是需要的，大家亦應該為了光復香港而共同努力。

今次的論壇討論就此結束，但香港人在海外的運動只會不斷延續落去，尋找新的方向。香港的未來，我們拭目以待。

如何留得住高潮？

新海外組織的危與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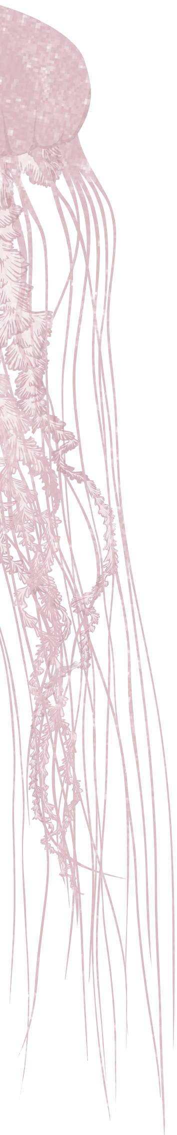


作者｜鍾燊豪、千八女鬼



若果老牌海外香港組織是一段婚姻——長久、穩定、各人熟知大家的「身位」——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那麼一眾於反送中浪潮之後於北美誕生的學生組織更像是「拍散拖」（hook-up）。[1] 這類「即興」的學生組織，散佈北美不同城市，包括甚少華人聚居的美國中西部。許多海外學生組織快聚快散，但他們以不同方式，在北美社會宣揚及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例如在當地學校舉辦抗爭藝術展覽、與各州官員會面遊說議員支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各大校園與支持中共組織抗衡等等，這些短暫的火花為香港社運在海外增加了不少光芒。但隨著肺炎疫情來襲、香港社運熱潮減退、中共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其管轄範圍包括香港境外），令社會人人自危等種種外在阻礙，加上各組織的成員因畢業、移居而自然流失，大部分這類「拍散拖」的海外學生組織也面臨解散的危機。據此，我們早前與三個北美海外組織的成員進行深入訪談，這三個組織分別是：位於W城的組織S、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學生組織「安港學盟（Ontario Hong Kong Youth Action, OHKYA）」、以及三十多年前因八九民運應運而生，位於洛杉磯的「洛杉磯香港論壇（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 HKFLA）」，再結合其中一位作者個人於北美M城籌辦學生組織Y的經驗，紀錄這些短暫火花緣起緣落的同時，也想借老牌海外港人組織窺探海外港人組織的長青之道。

1. 香港的反送中浪潮亦波及遠在地球另一面的北美。2019 年，數以十計位處美國及加拿大的大學成立了香港社運關注組織。這些組織散落於北美的不同州分，除了港人的留學熱點西岸加州、加拿大，亦有組織設立於較少華人聚居的美國中西部。



海外香港學生組織緣起

「是緣份。」組織S的H如是說。2019年，H的一個舊同學跟她說她住的W城有人希望想支援香港社運，但印刷文宣費用昂貴，希望H可以幫忙利用學校設施印刷文宣。後來她們當中有人說不如乾脆搞個組織吧。W城有頗多香港移民聚居，H和朋友首先靠相熟朋友口耳相傳招聘成員，當中不時遇到人說：「我之後要返香港，都係唔搞喇。」也有些熱心人士例如J，他主動詢問同在V城的中學同學有沒有人舉辦香港社運關注組，從此得知了組織S。J需要填表、通過面試等才能入會。H解釋，那是生怕一些支持中共的學生潛入組織「搞事」。J說，面試其實是活動完結後談天吃飯，他們想看看我是不是有心參與活動。

同一時間在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省，另一群身在異地的香港青年受到反送中運動的鼓動下亦懷著滿腔熱血，聯同安省各地的香港留學生，希望在遠方做些事情聲援香港，於是在安省首府多倫多辦了一次又一次的聲援集會，最後順水推舟成立了「安港學盟」，而皤戴就是組織的草創成員之一：「本身都係靠friend搭friend，好多本身都素未謀面，慢慢就連結咗唔同地方幾間大學嘅HKSA (Hong Kong Student Association) 或者關注組搞活動，搞搞下得番多倫多附近嘅HKSA比較多聯絡，所以咪索性成立一個組織囉。」

至於在位處美國中西站M城的組織Y，不同W城，那裡莫說香港人，連華人也甚少。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期，其中一位筆者從香港回到荒涼的M城，聯絡唯一一個在派對上透過朋友的男朋友認識的香港人L，看看我們能在校園做些什麼，我和L同在M城大學工作。M城大學的香港學生組織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於校園內舉行任何有關反送中運動的研討會，於是我和L著手在學校成立了香港人權關注組。這情況並不出奇，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很多海外大學所謂的「香港學生組織」也拒絕舉辦任何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活動。細問之下，大量這些所謂「香港學生組織」其實是由中國大陸學生運作，有在美國中西部的「香港學生組織」更因為成員不懂廣東話而要以普通話舉辦會議。另外一些海外香港學生組織是由對香港社會活動感覺淡薄的「竹昇仔」營運，他們當中很多人只關注吃喝玩樂多於香港的社運，或者是不關心政治、著重專業發展的升學就業網絡，這些組織多數以「政治中立」為由置身事外、明哲保身。在我居住和工作的M城，雖然香港學生組織沒有以組織名義參與活動，他們有成員認同我們人權組織的理念，加入了我們的關注組，並利用他們既有的學生網絡招聘其他成員。我和L也透過一些支持香港的東亞研究教授以及一、兩位多年前移居M城的香港教授宣傳組織Y，漸漸聚集了十數個關心香港但政治光譜非常不同的成員，當中包括教授、博士後研究員、研究生、本科生。



Source : Cera_on_unsplash

友誼作為政治推手：「有一天，我們會在煲底下一起喝酒。」

在W城，H和J說，每一次有關香港的政治活動完結後，他們也會去聯誼——吃飯、喝酒、打機，這些聯誼活動令彼此熟絡，談天說地，他們更說聯誼活動是他們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動力。J坦言他當初「入會」也是想在W城認識朋友，他覺得這些聯誼活動讓人期待每次聚會，J說：「即係，每次開六、七個鐘會，返工放工都會辛苦啦。」H也強調，搞聚會最主要是能夠認識新同學，大家都是義工，在海外舉辦活動非常吃力，H常跟成員笑說：「放鬆下啦香港人，唔好咁緊張啦。」但組織內也有反對聲音，批評這樣聯誼太「casual」，例如有女生本身不太喜好喝酒、也不喜歡像J和H那樣玩至通宵，她因為這樣「性格不合」，漸漸與組織的其他成員疏離。H形容：「大家好多inside jokes她不知道，我們整群朋友玩至通宵達旦，她吃飯、喝酒都沒有參與，她性格與大家太不同了。」

另一方面在多倫多，嶓戴和他們的同伴除了組織日常工作以外，亦很依賴成員之間的「圍爐」聚會維繫感情，甚至在難關時化成彼此的心靈支柱。嶓戴如是說道：「其實『圍爐』都係一種情緒支援，例如每當香港發生好難過嘅事嘅陣我哋一班成員都會聚埋一齊，就算lockdown期間我哋都會搞網上『圍爐』，內容間中會提及政治，但好多時候都係閒話家常為主。」此外，他們亦希望在過程當中，關心香港的港裔加人義工可以更認識他們上一代故土，加強他們的香港認同。「好多CBC義工（Canadian Born Chinese）都唔係太了解香港呢幾年發生咩事，咁我哋香港呢啲嚟嘅留學生就會分享一下自身嘅經歷，upate一下佢哋咁。」

至於在M城，大概第一次香港活動之後，我們幾個來自香港的人在韓國燒烤餐廳舉杯說：「有一天，我們會在煲底下一起喝酒。」在荒涼的M城，我們為香港一同努力似乎是件溫暖的事情。我們和W城的組織一樣，每次開會後也總會做些聯誼活動，而以聯誼方式也成功吸引了很多新成員。例如我們有個ABC朋友（American Born Chinese）本來對於香港政治活動感覺淡薄，但有次開會後組織成員在餐廳慶祝我的生日，恰巧遇見這位ABC。有人把他拉了過來，之後半推半就地，他便開始參與我們的活動。這位ABC最後也以美國公民的身份，代表我們組織接見該州的參議員。但和W城的經歷相似，我們極度依賴聯誼活動來維繫感情，為組織付出較多的成員也是積極參與聯誼的人，有時候我們由晚上十時打麻雀至翌日早上，不是所有成員也熱衷社交。漸漸地，不太熱衷社交的成員（多半是女性），便漸漸淡出組織。

無論是哪一個受訪者，海外學生組織均極度依賴個人社交網絡、聯誼活動來召集同樣有抱負的成員。主要原因是，一、因為在海外「同路人」已經不多，尤其是偏遠地區，而很多既有的香港海外學生組織因為種種原因對香港社運置身事外。我們當中關心香港，但對於要做什麼、應做什麼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聚集有心人最快捷、方便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社交聯誼作招徠、依靠自身網絡拉攏成員。二、大部分海外學生組織的發起人和成員不是「吃政治飯」的政治明星、政治研究員，他們不是為了光環、工作需要而搞政治，往往只是一份關心香港的心。但異鄉人一方面要應付在外入鄉隨俗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維繫紮根香港的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與在外地的香港朋友茶餘飯後傾談香港。三、如今要舉辦任何有關香港社會運動，也會受到各方監視，所以「搞小圈子」亦關係到安全需要：例如在W城，H和J的香港學生組織曾一度被某些中國學生組織追擊，有人揚言要滲入H和J的活動在水中放瀉藥、用磚頭攻擊示威者等等，H和J其後因安全問題取消了他們原定在市中心舉辦支援612的電影放映會。[2] 在所以很多組織在邀請新成員時，都是依靠現有成員邀請相熟朋友加入，確保新成員是可信賴的。

聯誼活動在海外學生組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社交是政治活動的推手，並不是附帶而來的效果。但從W城和M城的個案隱約可見，這種以友誼為骨幹的組織運作往往會排斥不擅社交，或不喜歡通宵達旦社交的人，尤其女性（例如很多女性因為安全問題，會盡量避免深宵歸家）。在這種組織架構下，這些人即使有心為香港做點事情，也很難與組織內大多數人磨合。

2.2019年6月11至13日，大量示威者包圍香港立法會，反對立法會二讀通過《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者一度佔領龍和道、夏慤道和金鐘道，短暫癱瘓金鐘的交通。


Source : JazminQuaynor_on_unsplash

海外香港學生組織緣落

建基於友情、社交的海外香港學生組織，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靈活地召集成員，但這樣的組織多數沒有明確權責，很多時候因為人事、分工問題出現分歧便面臨解散。

在W城，J和H坦言在運動後期，組織開始鬆散：「越做越伏，搞活動相處唔到就唔得。」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人事問題和組織架構問題。在人事問題方面，H表示組織撮合了一些男女，他們為了不影響群組既有的運作，一般都只會進行地下情，H的前男友也是透過她在W城的香港組織認識的：「我哋搞組織之後開始一齊玩、食宵夜。但係我哋兩個都唔想公開，想繼續搞活動，唔想畀人閒話家常。」但在某些情況，例如有人單方面追求不同女成員，便令組織內很多人覺得困擾，J和H說：「我哋有人搞唔同女成員，不停PM佢哋。個男仔會話自己有depression，叫女仔陪佢去睇夜景、睇日落。」除了男女之情的問題，他們漸漸在分工問題上出現分歧。H說：「我哋本來係有分話事人，係有主席，之後有人想做、又有人想爭住做，但我哋慢慢唔想有個人lead。跟住就話不如大家輪住做『班長』依個位，『班長』有兩票。」但這種制度並不能有效梳理群組內的不同意見，特別在很多細節的事情上，H說：「我哋之後嘈嘅都係technical嘢，例如有人話悼念會要點樣喺樓梯打斜企（站），我覺得唔make sense。」之後陸續因為各種分歧，不同成員不滿退出。再者，香港的社運熱潮漸漸淡化、肺炎疫情來襲，大家只能舉辦網上視像活動，W城的組織漸漸變得不活躍。J這樣總結他們的關係：「大家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聚散終有時，但很多海外學生組織聚得快、散得也快。

在M城亦有大同小異的情況，我們組織最大的危機亦是分工問題。我們的組織實行「無大台」的宗旨，如果有人想要籌辦某一種活動，她可以在群組內招攬有興趣的成員幫忙，大家也是憑興趣自由參與。有一次，我們的組織想要在M城的電影院舉辦香港電影放映會，當中涉及和M城大學申請經費、與香港電影分銷商洽淡等事宜。我們的組織有博士生、本科生、教授、職員，在商討活動細節時，有博士生投訴本來答應幫忙的本科生拖延進度，沒有做到如期的工作，引起雙方在組織內爭執，包括人身攻擊。結果最後導致有人離開群組，雙方由「朋友變成敵人」。我和其他幾位成員有嘗試「勸交」作中介：「大家都係義工性質，如果有人做得唔好唔夠咪三口六面講，大家係隊友。」但大家已經吵得面紅耳赤，又因為「做得唔開心咪唔做」這種無可避免的心態，於是令組織變得鬆散。後來，因為很多人相繼畢業、搬家等等，大部分成員也漸漸淡出組織。

也許「睇餸食飯」才能天長地久

面對曇花一現後所出現的各種內部危機，這些新興海外組織應該何去何從？對於這些組織而言，要繼續打「國際線」，就需要思考如何細水長流，發展出「長期穩定」的運作模式。作為新興組織之一安港學盟亦不能置身事外，在熱潮過後如何將組織延續下去，成為了組織內恆常討論的議題。

除了因人事而引起的紛爭，路線之爭也是矛盾的苗頭。在熱潮退卻加上肺炎疫情雙重夾擊下，新興組織亦意識到不能再單靠實體集會引起當地社會關注。安港學盟成員嶓戴表示，他們路線之爭一般停留在規模（「大搞」還是「細搞」）以及定位（「政治游說」還是「草根傳播」）兩個層面——由於游說這種「high end」的事務已有更龐大的組織在處理，而且其投放的資源亦遠比新興組織所及能力大。再加上安港學盟將自己定位為安省的學生組織，他們認為草根化是目前較為可行的路線：「我哋會想比較喺加拿大社區上做多少少嘢，吸引一下地區內年青人對香港議題嘅關注。我哋亦會嘗試由加拿大嘅本土事務做切入點，例如係近期比較受注目嘅原住民議題。另外要知道加拿大係一個比較『大愛』嘅國家，所以我哋亦都會同其他國際事件同團體做串連，例如係緬甸示威、反北京冬奧等等。」

安港學盟在發展方向上的掙扎，只是眾多海外學生組織的縮影，不過比其他組織幸運的是，安港學盟在掙扎之下仍維持一定的行動能力，至今仍不斷舉辦不同種類的活動（當中包括兩期「如水」雜誌的團購活動，如水仝人就此謝過），在新嘗試下尋求出路。

另一方面，因六四事件而成立的「洛杉磯香港論壇」對比這些新興組織而言，就猶如已步入婚姻數十載的老夫老妻，但殊不知早在三十年前，其實他們也經歷過類似的陣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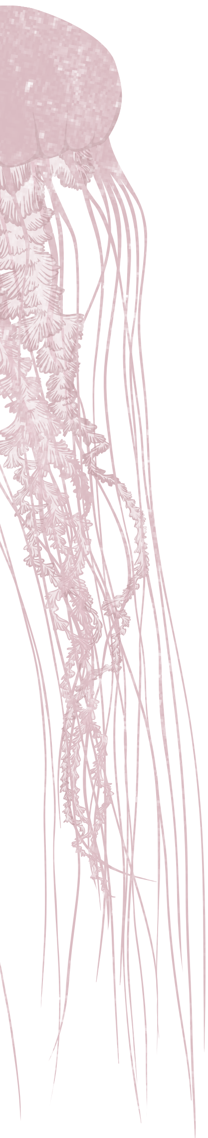
Source : Cloud

其中一位始創成員Charles向我們細訴，九十年代隨著中美關係轉好，不少港人對民運關注漸淡，加上不少香港留學生也相繼離開洛杉磯各奔前程，組織亦只能靠少量留下來的人維持基本運作。Charles形容，在 2014 年雨傘運動爆發前，在北美有關香港政治議題的大型集會幾乎絕跡，幸而於低潮時他們仍堅持每年在洛杉磯中國領事館外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但剩下的活動基本上日常剩下的就只有骨幹成員之間的聯誼聚會：「間中煲下湯、燒下嘢食，有時又一齊睇下《鏗鏘集》嘅帶、睇下波，香港有立法會選舉就一齊睇點票直播咁囉。」隨著時間流逝，組織圈子歷盡風雨，在鉛華盡洗、去蕪存菁後，留下的骨幹分子對彼此認識已深，友誼自然比一時冒起的團體更為堅實，為日後留下強大的信任基礎。

當我們進一步向組織各核心成員詢問組織的長青秘訣之時，他們不約而同提及「睇餸食飯」一詞：「知自己有幾多資源，知自己commitment可以去到幾多，咁咪去做幾多囉。」**所謂「睇餸食飯」，其實就是量力而為，認清自己的能力及定位**。隨著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由以往「冇乜嘢可以做到」到及後源源不絕的海外集會、黃色經濟圈，以至是流亡手足的支援需求，洛杉磯香港論壇緊守「睇餸食飯」的方針，拒絕盲目開拓組織「業務」，反而是積極利用自己的「老字號」作各方橋樑，為活動提供號召力。同時，他們亦為不同在地組織作資源配對：「例如有啲新組織想搞放映會，咁我哋就會用我哋組織嘅名義嚟邀請導演做放映會嘉賓，佢哋見我哋有少少歷史多數會比較願意出席。」「我哋知道其實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做，亦都有人邀請過我哋一齊搞黃色經濟圈相關嘅計劃，但奈何我哋又真係做唔晒，唯有將啲計劃轉介畀其他我哋相識嘅有心人去做。」

問及他們心目中海外港人組織的長遠定位，另一位成員Clement認為在政治低潮下，海外港人團體可以嘗試轉而著手關注非政治、但更根本的組織問題：「其實好多香港人啱啱嚟到嘅時候真係比較少香港朋友，始終我哋香港人喺海外嘅凝聚力相對係較低，都係要靠有人搞活動或者『friend搭friend』先識到其他香港人。」他們表示，長遠而言組織希望透過定期舉辦比較私人的「迎新」派對，了解新到埗港人於生活上的不同需求，並為他們提供相應資訊及幫助，在協助他們融入當地的同時，又可以慢慢凝聚一個穩定的海外港人圈子。還原基本步，海外組織的未來，也許亦要回歸「組織」的基本。





總結

我們把不同組織經驗寫出來，是希望「拋磚引玉」，首先讓讀者體會到有聚散、有分歧這些人之常情，然後再一同思索在「打國際線」的路上，我們要如何一方面靈活地利用個人交情作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在這種以友誼建基的組織上，怎樣有系統地處理分歧、危機，平衡各方得失。

人事問題在任何組織工作都是無可避免的。從W城和M城的個案可見，很多類似的海外學生組織也是以友誼作為行動基礎，大家普遍亦以「合則來、不合則去」的心態看待他們在組織內的位置，於是在有危機、重大分歧的時候，往往很快便放棄籌劃新的制度來梳理這些分歧。無可否認，在較少港人聚居的偏遠地區很難效法像洛杉磯、多倫多有固定港人群體的城市。安港學盟的活力以及洛杉磯香港論壇的謹慎則向我們展示了聯誼的另一種可能性。在他們身上我們除了看見量力而為的原則之外，還有韜光養晦的重要性：低潮之中深耕細作，還原「組織」基本步，紮根當地社區，凝聚在地港人，經營盟友社群網絡，或許才是海外在地組織的去路。

在此祝願各地港人組織，即使及後只能細水長流，但起碼能天長地久。就讓我們一同靜候下個時機來臨，我們最終定能滴水穿石、百川歸海。



國際線面面觀

國際線與跨族群連結


作者 | 式，六月



Source : William_Isaac_Thomas照片_Wiki

引言

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 Isaac Thomas的名言：「If [people] define situations as real,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簡單來說，就是人對處境的理解和想像，影響著他們如何行動。不同組織如何理解「國際戰線」和「國際關係」，也會影響著他們如何行動和與其他組織產生連結。社運過後，因著香港的政治狀況，不同海外組織開始思考如何延續族群的身分和影響力。與此同時，這些團體也必須面對族群內外出現的許多矛盾、裂痕和爭論。到底香港人是如何在沒完沒了的左與右的政治爭拗中，繼續合作，在當地社會發揮影響力？香港人又是如何與中國民運人士和其他各地受極權壓迫的流散群體合作？這篇文章通過訪問五個位於北美的香港人組織，和一些親身的觀察，嘗試探討這些香港人如何產生「合作」關係。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們先逐一簡介五個受訪團體如何連結族群內外的人。第二部分會探討這些團體在合作的時候所產生的政治力量和內部張力。



Source : ZacharyKeimig_on_unplash

五個海外港人組織

洛杉磯香港論壇在 1990 年成立，當時不少身處洛杉磯的香港留學生、專業人士和移民，一方面看著香港正接近回歸中國，另一方面看見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六四屠城慘劇，於是決定在當地成立一個香港人組織。其實許多這些八九六四後成立的海外香港人組織，他們的成員在成立初期均處於求學和初入職場的人生階段，加上當時出現的移民潮，或多或少與今天的逃難潮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當時的歷史背景卻與今天相當不同，在 80 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主要是建基於英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協議。香港人當時夾在殖民地主義退潮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下，不少人提出民主回歸論作為一種未來想像。而基於蘇聯共產政權在 1989 年倒台，不少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均曾想像中國共產黨，在六四事件過後，必然會在兩三年後倒台。然而，時間證實了這是錯誤的判斷和想像。但是，這種想像當時的確讓不少支持民主回歸的香港人與想像共產黨倒台的中國民運人士產生一種聯繫。而洛杉磯香港論壇，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底下成立。成立初期主要是舉辦一些悼念八九六四的集會。而由於當時許多民運人士仍在逃難當中，初期不少海外城市的六四集會主要由香港人舉辦。

正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指出，香港人對於「中國人」身分認同在 2008 年奧運前達到了高峰，遠遠超越認同「香港人」身分。在這種景象之下，洛杉磯香港論壇和許多其他海外香港人組織一樣，在千禧年代處於組織的低潮。當時一直追求的平反六四也處於一種遙遙無期的狀態。然而，這種狀態引來的是許多中國民運組織內部的矛盾和紛爭，不少組織逐漸分拆成更細小的個人組織。而香港人組織舉辦的六四集會，也出現人數下滑的跡象。洛杉磯香港論壇在當時與民運人士的合作模式長期處於一種 need-based（需求取向）的關係。（下文詳述）

經過東北發展下的本土運動、反對國民教育運動、雨傘運動到近年的反修例運動，「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不斷下跌；「香港人」身分反而不斷上升。加上反修例運動，才讓洛杉磯香港論壇再度變成一個較活躍的組織，並舉辦許多不同類型的香港人集會和政策倡議有關的活動，例如寫信給國會議員的行動。另一個面對類似歷史過程的海外「老牌」的香港人組織，就是受訪的溫哥華支聯會。

溫哥華支聯會也是在八九民運後、香港回歸前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當時的組織的運作大多集中關注平反六四和民主回歸的這些議題上。雖然名字中有「支聯會」三個字，然而溫哥華支聯會主席Mabel在受訪中表示，他們的組織與香港支聯會沒有直接關係。在加拿大溫哥華這一個香港移民聚居地中，Mabel曾經表示，他們的議題集中在中國維權律師、劉曉波、新疆問題等。對於溫哥華支聯會來說，他們一直以來都希望連結不同面對打壓的少數族裔，讓香港議題與其他面對打壓的民族的議題結合，在當地社會產生一股更大的聲音。這種結盟的方式在反修例運動前已經成型，比近年的奶茶聯盟更早出現。而這次受訪的洛杉磯香港論壇、北加州香港會和NY4HK均有組織當地的奶茶聯盟。

北加州香港會與中國民運人士一直處於一種互相協調的關係。縱使他們未必與中國民運人士在所有議題上看法一致，但他們仍然會共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和其他協作。他們彼此之間也會互相溝通並且幫助，讓這些集會可以延續。事實上，北加州香港會在2011年才成立。受訪的Ken表示，當時一些成員表示不贊同把組織變成一種「formal organization」。因此，北加州香港會在成立的時候，傾向透過組織內的核心小組商討活動的計畫，然後再尋找一些香港人作為志願者幫忙籌辦。事實上，這也是不少海外香港人組織逐漸傾向的組織模式，讓活動計畫變成組織的核心綱領，並減省組織的行政工作。而這種基於活動為主的組織模式，他們在數個月前的奶茶聯盟集會中，也是透過與其他組織合作，將能量集中在活動籌劃的工作上，避免了一些可能出現的政治性爭議，繼而連結不同種族的流散者。

NY4HK在美國紐約的組織運作也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組織內部會就活動內容進行商討。當一些成員對於組織與其他組織的合作關係有異議的時候，他們會三思是否與那些組織共同舉辦活動。然而，NY4HK與奶茶聯盟與中國民運人士在過去這段時間的合作關係，長期也是處於一種project-based（專案取向）的關係。當緬甸的民運人士提出一些想法和需要的時候，組織便會盡量配合他們的需要共同策劃活動。正如其他海外香港人組織，NY4HK在過去幾年的活動，大部分都配合著香港的反修例運動進程。然而在社運過後，當香港的運動逐漸變成高壓的靜態，這些海外組織必須尋找不同方法在海外延續香港人的身分和政治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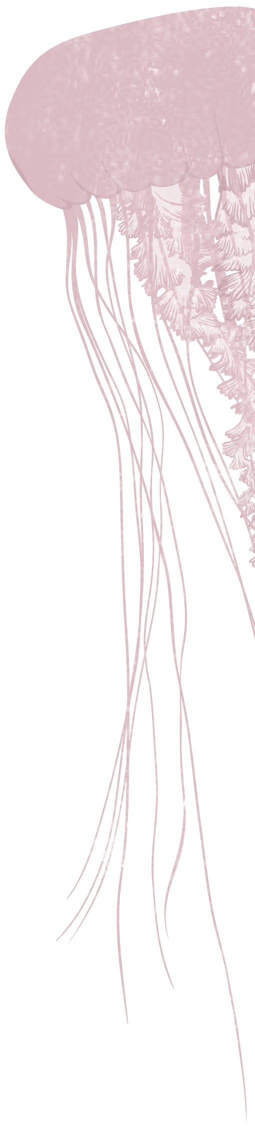
流傘 Lausan.hk 雖然也是離散港人組織，但與上述組織不同，流傘所凝聚的不是聚居於同一地域的港人，而是流散各地但同樣認同左翼理念的港人及其盟友。他們認為整場運動的論述過度流於「自由」對抗「極權」的簡單二元對立，遺漏了階級鬥爭、反種族歧視與解殖等重要維度。[1] 一方面，階級與種族等問題往往橫跨各國邊界；另一方面，階級與種族等不同的對立亦揭示了沒有所謂「美國」、「英國」、甚或「香港」的單一個體或連貫一致的族群。故此，受訪者PL認為港人不應把國際線侷限於連結各國政府，亦應連結各國不同的工會、工人組織以及進步團體。若不這樣做，我們便會錯失學習其他草根組織（grassroots organizations）的抗爭模式的機會。流傘亦的確組織過不少這類的連結論壇，例如在今年年初時就組織了美國、香港、哥倫比亞以及馬來西亞清潔工工會的論壇。他們亦多次嘗試連結香港抗爭與當地的政治議題，而且會與其他香港海外組織以及當地草根組織合作。他們既與美國Black Lives Matter示威者合作過，亦與其他位於紐約的港人組織抗議中資問題，抵制匯豐凍結許智峯的資產。雖然流傘有完整的組織架構也積極參與這些示威活動，其主要定位仍為提供分析、分享資訊，與其他草根組織互相學習，並支持各地的進步與工人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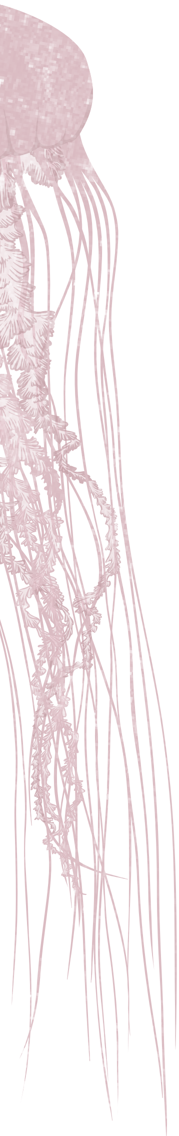
1.https://lausan.hk/about/

民主中國、香港獨立 Or Why Not Both?

近年研究流散政治的學者開始關注，家園的政治分歧如何影響流散群體在外的群體性。學者Dana Moss在她的新書中提到，在流散者家園的反政府黨派裡面，不同政治主張的衝突可以在海外產生一種「傳播性衝突」（Conflict Transmission）的影響。類似的問題可以在海外港人對於「民主中國」與「香港獨立」的兩條路線上觀察到。然而，這兩條路線並非勢不兩立。下文將先討論這兩條路線在香港的衝突，再討論海外群體如何處理這種分歧。

在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前後，不少本土運動相繼在香港出現。這些本土主義的崛起，產生了林林總總不同的論述。從理論層面的陳雲華夏遺民文化論、徐承恩海洋族群論等，到街頭上的反水貨客行動、本土保育行動等，再到政策倡議的土地發展研究等均可以看見，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逐漸增強。不同的論述，不論是對是錯，也令本土意識隨著大大小小社會運動不斷增強。當然，在這種歷史的前提下，不得不提這些非建制人士對於中國和香港政府的理解，也是建基於一種全然失信的狀態。與此同時，不少人在過去十年開始對「民主回歸」或所謂的「大中華膠」論述進行批判，出現了許多本土反支聯會六四集會的聲音。「中國民主發展」與「香港議題」逐漸被認定為兩個不同的議題，而非「大中華膠」那種以「民主香港」推動「民主中國」的劇本發展。然而，不少人在國安法後均會認同，當香港本地組織運動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的時候，香港獨立只能夠在所謂「支爆」的前提下才會實現。雖然從筆者的觀察中，許多人如今仍然會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分開成兩個不同身分來作分類。然而，這種「支爆」的想像卻又有趣地把「中國未來」與「香港未來」再度聯繫起來。正如北加州香港會的Ken在訪問中提及，「香港要有實際的改變，要有一個民主的進程，就離不開中國的改變。不能撇開中國問題來解決香港民主，這是對現實基本的理解。」那麼，「民主中國」和「香港獨立」，在海外香港人組織的行動中，是否兩條不能交疊的平行線呢？也許不是。





的確，許多受訪的海外香港人組織均提出，中國議題和香港議題是密不可分。然而，當牽涉到主體身分的問題時，不少人卻又會認同「香港人」身分本身的重要性。然而，當香港人組織和中國人的組織合作舉辦活動的時候，有時不免仍然會出現一些尷尬的場面。例如筆者不時在中國民運人士與海外港人組織共同舉辦的活動中，從中國民運人士的發言中聽到他們稱呼「香港人」為「香港同胞」。一些共同參與的香港人曾經對筆者分享過他們對這種身分認同的尷尬與矛盾。然而，站在合作的立場上，不少香港人組織在訪問中均透露他們不介意與中國民運人士共同協作。站在反抗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前提下，「香港獨立」和「民主中國」這兩個議題是可以並存的。

例如洛杉磯香港論壇與中國雕塑家陳維明在Yermo的Liberty Sculpture Park 合作過程中，中國的民運人士會讓香港人在連儂牆上寫上香港獨立。而香港抗爭者的雕塑上掛著的旗幟，正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公園的其他地方，除了由紐約的Lion Rock Cafe所建立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壁畫，還有六四坦克車、（近期被人惡意毀壞的）習近平病毒的雕塑。當香港人組織和中國民運人士能夠把矛頭對準中共政權，「香港獨立」與「民主中國」這兩條線便可以找到交疊的共通點。而洛杉磯香港論壇、NY4HK和北加州香港會的訪問中均共同提到，中國民運人士組織與香港人組織的關係，長期處於一種project-based（專案取向）的協作關係。例如，當中國民運人士較傾向長時間的研討會，而香港人較傾向集會和政策倡議行動的時候，不同活動的籌辦過程中就會有分明的分工。抑或，當主辦者與協助者的角色分明的時候，合作之中就能夠減低不同模式之間的衝突。



Source :EtienneGirardet_on_unplash

跨國受苦共同體

面對中國在東南亞與鄰近國家不斷產生的張力，溫哥華支聯會在近來聯合菲律賓、印度、泰國、西藏、維吾爾族和中國流散組織一同舉辦「10.1 Condemn CCP Hostage Diplomacy」集會。透過地緣政治的張力，溫哥華支聯會與這些不同地方的流散者組織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議題來反抗中國共產黨。而這次集會也把孟晚舟事件中，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納入了行動的議程。正如溫哥華支聯會主席Mabel提到，加拿大本地社會在兩個加拿大人被中國政府關押以後，對於中國共產黨有更大的反抗。而透過這個關押加拿大人的事件，可以讓香港議題融入在一個更廣闊、也對加拿大人來說更切身的政治議題中。在這個過程中，不同來自東南亞的流散者組織也可以參與其中，讓地緣政治的張力成為不同組織合作的連結。

類似的連結可以在早前的奶茶聯盟遊行中看見。當NY4HK與緬甸、泰國和台灣的流散者組織合作，一同舉辦奶茶聯盟的遊行，聲援在緬甸的抗爭和譴責軍隊的暴力鎮壓，這種連結更廣闊的國際想像便化為街頭行動。NY4HK的Anna在訪問中表示，當時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因為香港本地的政治運動已經無法繼續進行，而海外香港人需要尋找一些出路讓群體的身分和行動可以在海外社會延續。而當時緬甸的軍政府鎮壓，正正是一個時機讓香港人的組織可以透過協助緬甸流散者舉辦遊行，來繼續持續海外香港人的反抗行動。然而，在紐約的集會中，不少媒體的焦點都集中在緬甸在地的情況。Anna形容，香港人組織在過程中是一種協助的角色。而這種互相協助的關係，在未來可以以project-based（專案取向）的方式繼續進行。雖然在政策遊說的層面上，不同國家的流散者難以聚合，但這種合作的關係讓香港議題可以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地圖上，與其他國家的流散者維繫跨國的盟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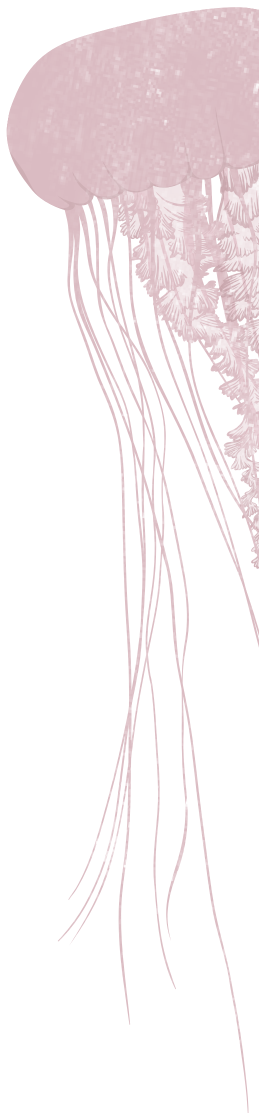
在筆者的觀察中，這些流散者的聯盟必須使用普世價值的旗號來串連不同國家的政治衝突。由於不同國家的政治環境大相逕庭，當「反對中國共產黨」這類具備針對性的議題不能有效聯繫盟友之間的關係，這種連結必須以一種「極權下的受苦共同體」的想像維繫。然而，這種想像與一些關注普世價值的跨國運動不同，這種以地緣政治為聯繫的聯盟並不是對世界上所有發生極權壓迫的事件均帶有相同的關注。聯盟的關係必須與香港的議題帶有相關性，甚至能夠正面推動香港人組織在當地的游說工作。正如溫哥華支聯會的Mabel提到，這些包含普世價值的意識，其實在加拿大的政治格局下，是一面能夠引起關注和帶入國會進行游說工作的旗號。因此，這種結盟方式是具備策略性的考慮。

然而，當這些香港人組織透過地緣政治的張力來推動聯盟的行動或政策游說的工作的時候，他們必須秉持非政黨化的政治取向，來吸納當地社會不同政治派系對香港人議題的支持。這部分與一些以左翼或右翼政治理念為基礎的香港人組織截然不同。當這些帶有左或右的政治理念的團體試圖與這些非政黨化的香港人組織合作的時候，又是否會出現矛盾？在這次的訪問中，其中一個組織流傘，正是以一個國際反霸權的意識為組織的核心。然而，當遇上必須透過非政黨化的模式，依賴「外國勢力」來幫助香港人的海外港人組織時，到底左翼的流傘如何能夠與香港人組織產生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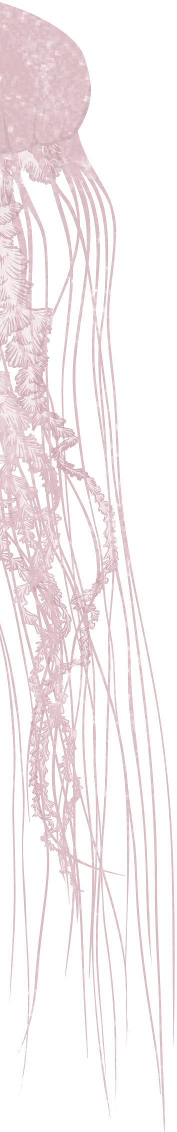
當左翼運動遇上地緣政治

流傘的PL認為當其他香港人組織嘗試保持不分黨派時，容易忽視了香港議題的倡議、當地政治以及全球格局的影響。當我們告訴世界應該關心香港面對的苦難以及中共極權統治時，我們往往會跟各地政府及人民說為什麼這不單單影響香港。我們往往會搬出種種論述，指出中共的極權統治意識以及戰略亦會置當地人民的自由及民主於威脅之中。但這論述若然成立，那也代表香港的倡議成果也會牽動各地人民的利益，而這是好是壞，往往取決於這些倡議法案的內容。當港人在美國推動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時，流傘連同其他香港及外國的左翼與進步組織，發出了批判該法案的聲明。[2] 這聲明不僅提出了該法案未能完善保障港人權利的地方，更指出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歷史上如何包含帝國主義色彩並往往踐踏各地的民主及人權進展，並直斥各種所謂抗中法案往往把美國財政預算花在擴充軍備之上而忽略本地基建需要。且勿論我們是否認同這個批判對美國政治外交的理解，因為這個批判帶出了更大的問題。當倡議者拒絕在外國政治上表態時，他們是否也失去了作出對國際格局作出判斷的本錢？若然我們不分左右地支持一切香港的議案，若然這些議案傷害當地或其他地方的民眾的權益時，我們是否真的把其他族群當成盟友？

PL在受訪時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若然我們在政治上不分左右，我們能否妥善梳理我們最終在爭取什麼？流傘成員認為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止步於真普選，亦即不可能單單是程序民主而已。一個國家可以擁有程序完善的民主制度，但實權可能仍被資本家或是當地的政治精英牢牢把持。不少非洲的新興民主往往陷入類似的困局，而這些國家很容易便會重新返回極權政體的路上。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中曾指出民主的真諦在於人民能共同決定並控制自己生活的條件，而只有當人民有這控制權時，他們才可以說是活在自由之中。PL認為真正的民主無可避免地需要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不然一個有程序民主的香港只能說是換了一個主子而已，不能說得上是民主或自由。



2. 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295



未必每一個讀者也會認同左翼對香港的願景，但流傘的目的不是要硬套一個期許於香港人身上，而是帶出兩個海外港人而及倡議者需要討論的關鍵問題：到底我們是否真的有一套國際視野？到底我們所爭取的願景是什麼？當我們缺乏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時，我們便很容易在國際倡議上被當地政府牽著鼻子走，而這正正是流傘所不願見的。流傘成員在其平台上所撰寫或發佈的文章，以及他們與多地工會以及其他進步團體所合辦的活動，往往就是想重新帶出這些問題並為港人帶來更廣闊的視野。而在這些活動或倡議中，PL有時是流散港人，有時是美國華人，有時是亞裔美國人，亦有時扮演其他角色。PL指出在他的政治行動中身份是非常strategic（戰略性）的。正因為他有多元的身份，他便可以在不同場合中以不同的身份面對不同的受眾。而這正正是離散者的國際線：離散港人仍然是港人，但也同時在當地擔當其他角色。一方面，這代表離散港人可以用其他身份來擴大香港的議題。但另一方面，這也代表離散港人的視野不僅僅是港人的視野，也是離散者的視野。

當筆者訪問其他組織時，他們基本上不反對流傘所提出的想法或論述。但他們依然對流傘的路線或與流傘合作有所排斥。首先，其他組織堅持要在國際倡議上取得成果，其組織必須保持bi-partisan/non-partisan（獲兩黨支持的／無黨派的立場）。其次，不少受訪者均表示港人組織的成員往往在當地政治議題上有相異的取態，若然要他們在這些議題上表態，便無法維持他們的合作關係了。故此，有受訪者表示他們很願意以個人身份去參與BLM或其他當地進步議題的政治行動，但無法以港人組織的名義參加。或許，這也帶出了離散港人的困局：在缺乏大台或政制基礎之下，若要維繫國際線及跨族群連結，就只有在維繫所有人的共識之下進行，既不能得罪外地其他群體，亦要避開不同海外港人的爭議。這個共識所留下的空間，是否足以支持起一套國際視野並帶來港人想爭取的願景？



Source : Cloud

結語：換一個更廣闊的視角？

何謂「國際關係」這個議題在近年引來林林總總不同的想像。除了自稱國際關係的學者在網上為大眾進行分析以外，還有熱愛預測的KOL不斷為聽眾解讀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然而，正如前文提到WI Thomas 的名言「If [people] define situations as real,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當人們認定一種國際關係的解讀時，他們組織行動的方針和決定也會隨之作出調整。

當香港在國際關係的舞台逐漸褪色，本地社會運動逐漸瓦解的時候，海外流散者群體必須依靠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思考自身群體何去何從。本文透過分析不同群體的連結：中國民運人士、跨國受苦共同體和左翼政治群體，來反思國際戰線的「連結」，solidarity，還有哪些可能性。

國際線面面觀

未受矚目的「國際戰線」


作 者 | 言，六月



Source : Cloud

由 2019 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從來都不缺乏「國際戰線」的身影。海外港人透過登報、遊行、遊說當地政府等活動，盼能維持世界對香港的注意，在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隨著政治人物一個又一個的流亡海外，英、澳、加等國家針對港人推出「救生艇」計畫而引發移民潮，「國際戰線」的含義和重要性一直被改寫。雖然大部分的流亡人士都選擇前往美國、英國或歐盟等實力足以抗衡中國的地區 ，試圖透過遊說倡議延續香港議題，但是直到現今，在一些香港人較少留意到的國家，其實亦有一班熱心的手足在默默繼續他們 2019 年開始的工作。當自己的行動對國際地緣政治、香港本身的情況影響甚微的時候，令他們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呢？「國際戰線」對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訪問了身處挪威和日本的香港人。說到挪威和日本，不少人第一時間便聯想到村上春樹，其實兩個國家都擁有活躍於當地的港人組織。這個專題我們跟挪威香港文化協會的N、Stand with Hong Kong Japan的S和Will談談，了解他們參加運動的初衷、經營組織面對的挑戰、港人與當地政府人民的關係、和怎樣看「國際戰線」。

文章的第二部分訪問了一個名為「住家飯」的英國香港人行動。談到「國際戰線」，不少人會立刻聯想到許多和國際政治關聯的行動。談到「社會關懷」的行動，不少人未必會立刻聯想到對「香港人」在海外建立身分的重要意義。但對於不少流亡的手足而言，三餐溫飽和關懷其實是非常迫切的問題。這部分的訪問會談到「政治」和「關懷」是如何透過「住家飯」的行動建立。



Source : tomtookit

挪威的香港人

Q: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在海外參與支持香港的活動的起因嗎？

N: 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因為 19 年反送中開始，然後一直做下來。挪威香港文化協會是在 2019 年八月成立的。我本身是長居在挪威的，覺得已經融入當地社會，但不會說自己是挪威人——說是「挪威的香港人」可能最合適吧。

Will: 日本的情況有點特別——這裏有很多有關香港的組織，而我和 S 是屬於同一個組織。我們全部都是素人——組織在 2019 年六月開始活躍，我在八月開始參與，然後做得越來越多。我原本是以工作假期方式在 2018 年來日的，現在我負責聯絡媒體、和其他組織協調。

S: 我 19 年六月開始在網上做翻譯，然後亦加入日本這邊幫手翻譯。現在我主要負責寫作。

Q: 進行遊說 / 倡議或政治活動時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

N: 我們不會直接政治倡議，但是偶爾會會見一些政治人物、議員等去解釋香港的近況。我們很多時候是透過媒體報導或其他的活動去帶動香港議題。最近因為香港的示威被鎮壓和世界各地疫情，媒體對我們的關注減少了。

Will & S: 最近最大的挑戰應該是疫情，令我們很多活動、計畫都遇到阻滯或停了下來。撇除疫情，我覺得在日本進行遊說和倡議工作可能比英美困難。日本人非常政治冷感，甚至政治家都很被動——他們偏向保守、不會承擔政治風險而主動行動。因為他們做或不做什麼，基本上都不會影響選民的決定，所以冒險並不符合他們自身利益。再加上很多政治家和他們的助理英文都不好，所以很少會碰外交議題。幸好我們的成員日文很流利，和他們見面的時候可以直接溝通，向他們解釋香港發生的事。我們每次會面都會充分準備，因為有時候議員缺乏對香港情況的基本知識，我們需要詳細地和他們解釋。

Q: 遊說/倡議的目標和重心會怎樣迎合當地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N: 我們其中一個重點是反對 2016 年挪威和中國的雙邊關係正常化聲明——這個聲明標誌了中方停止其多年來於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雪藏」挪威的外交措施。還有現時政府正跟中方磋商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內容進程非常不透明，我們也希望可以阻止。我們會透過會面、投稿報章、發聲明和聯署嘗試施壓政府和引起挪威民眾的注意。我們認為「人權」是向挪威解釋香港情況最好的途徑，因為各黨派、整體社會都會理解和支持人權和民主等價值。我們會和所有黨派做outreach，但反應因人而異——有些黨會熱衷一點，有些則沒有回音，但我們也會持續嘗試和那些黨連結。

總括來說，自由黨和社會主義左派對抗衡中國的議題比較有興趣。剛好今年挪威有大選，現在掌權的是保守黨，可是這次選舉工黨可能會贏，那我們面對的情況又可能會轉變。政黨對香港議題、中國議題的興趣也會因他們是在野黨或執政黨而受影響——在野黨對我們興趣會大一點，因為執政黨很多時候有一些經濟、外交上的顧慮。

Will & S: 其實目標上跟其他國家分別不大，都是圍繞中港人權問題遊說日本政府改變姿態和政策，例如倡議禁用新疆棉、針對港人提供優惠的移民政策等。日本朝野因為和中國的經貿頻繁和經濟依賴，普遍比較親中，我們倡議時可能比起西方國家要調低期望。我們要bipartisan的話也有很大的挑戰——因為一些黨派明顯比較親中。再加上「反中」這詞彙在日本比較敏感，我們會改用「對中政策」。

日本國會的跨黨小組需要來自各黨派的代表參與才能成事，所以當我們籌備跨黨小組的時候，名字改成「人權」，這樣會令跨黨小組的認受性更高，讓更多議員參加。用「人權」來解說香港，目標是將我們的議題跟人權和民主自由掛鉤。現在這個小組會關注國際人權問題，包括香港、新疆、最近的緬甸等。我們的角色便是解釋各種人權問題背後的中國元素，例如中國和緬甸軍政府的關係。然後媒體本來（2019 前）對「港獨」這概念很避畏的，可是上次會面請了獨立派人士（香港建國聯盟）他們好像也沒太大反應。

我們在日本民眾的支持者多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們可能因為見證過 97 之前的香港，明白和喜歡原來的香港吧。也有一些在日的外國人，例如德國人，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每次活動都會很努力的連繫當地人，如在大學舉辦交流會、藝術展覽等，希望吸引多些人注目。

Q: 遊說倡議之外，會籌劃什麼活動？

N: 我們主要搞街站、連儂牆、放映會、圖書館討論會、在報章寫文等，比較少示威。十一等重要日子我們會和藏人、維吾爾組織一起發起行動。我們亦聯同瑞典、丹麥的組織在 2020 年頭安排了一個 delegation tour。

Will & S: 之前說過，這裏有很多有關香港的組織，有些是專搞藝術展的，有些是遊說國會的，然後 SWHK 主要辦遊行。遊行可以吸引到途人的注意，向日本人解釋香港發生的事。本地人很多因為外語不好，對日本以外的事情了解不深。

你可能聽過平野雨龍（鈴子）——早起我們因為對日本這邊辦遊行的手續不熟悉，她也幫了我們不少。我們 19 年八月開始搞遊行，在 Twitter 宣傳，然後陸續有些媒體報導我們的活動，例如大紀元每次都會來（他們的讀者都關心中國議題），日本電視台 TBS、NHK 都有採訪過我們。因為疫情關係，我們暫停了遊行和群體活動，最近都是集中在網上。六月份我們連同 Asia Democracy Network 舉辦了關於奶茶聯盟的講座，有來自印尼、日本、緬甸的講者。除了 SWHK，其他組織舉辦過藝術展、文化祭、食品節、講座、放映會、交流會等，有很多類型的活動——當然這些也受疫情影響。

Q: 你所在國家對香港和中國議題的取態，怎樣影響你們策劃的行動？

N: 其實之前也說過，我對現在執政黨的期望不高，不覺得他們會有什麼實質的行動或表態。可是媒體的持續關注也令我們振奮，他們自 2019 寫了不少圍繞香港情況的報導和訪問。

Will & S: 就算是疫情之前，日本有些人如果看見外國人在示威也會不滿，他們想：你們為什麼跑來我的國家去做這種事情？你隨便去網上 Twitter 看看也不難找到這樣的評語——所以我們搞遊行也很在意本地人實體和網上的反應，不希望因為想把香港的事傳開去而弄巧反拙。尤其是 2020 年 4 月開始，顧慮日本這邊的緊急狀態和可能受到某些日本人的批評，我們也沒有再搞實體活動，只參加了其他抗中組織舉辦的大型示威。

我們 2019 至 2020 年舉辦了多次以香港為主題的遊行，但當然隨著國際對香港的注意度降低，日本這邊的關注也冷卻了。所以我們會聯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例如維吾爾組織）去搞活動，增加我們的靈活性。維吾爾人在這裏做倡議的歷史悠久，是一個扎根於日本社會的群體。亦有一些中國的民運維權人士，日本算是他們的一個基地。媒體的注意也減低了，他們會報導一些大事（例如 47 人案件）可是篇幅很短，比不起 2019 年甚至會去香港採景；最近多了香港人移民，開了一些餐廳和商店，媒體也有報導來日的香港人。可是夏天蘋果日報那宗新聞他們卻很留意，報導裡有訪問到 Will。

Q: 當地港人人數比較少，會為日常營運帶來挑戰嗎？會否令你們的關係更緊密？

N: 雖然有一些會員是學生，我們最核心的搞手都是長期在挪威的，然後有一些成員是挪威人。我開始之前亦沒有預測到會和那麼多香港人在挪威聚在一起——自 2019 年起，我們不時都會見面和聚會。

Will & S: 日本的確比較少長居的香港人。在日香港人都比較年輕，很多是二十多歲的留學生。然後有部分成員的日語不太流利，所以搞活動的時候有些限制，例如遊行或擺街站的時候，要跟途人解釋我們到底抗議什麼就會有點吃力。人手不夠是我們一個主要的挑戰，會影響我們計畫的活動種類和規模。其二便是經濟限制，因為我們的成員全都是義工，特別是運動早期有些人會差不多全職去做有關香港的事情，令他們收入不穩、生計受影響。那當然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狀態，所以我們都說要「搞掂自己先」。

因為緊密合作的緣故，我們成員的關係不俗，在爆疫情之前都有聚會的。遇見一班可以談得來的新朋友，也是一件幸運的事情。當然也有一些摩擦——我們有一個成員因和其他人意見不合所以淡出組織，他好像沒有再做有關香港的事了。

Q: 說起「國際戰線」你會想到什麼？你會如何定義「國際戰線」？

N: 是為了引起外國人的關注吧——很難說最終是否會幫助到香港。我們的目標可能是將香港議題帶到當地，提升他們的注意。有一些國家，例如英美，他們的影響力比較大，相對在國際戰線上比較重要吧。

S: 國際戰線並不只有「政治」的一面。我們在香港以外保留的文化和歷史，也是一種國際戰線。

Will: 其實不論你身在何方，只需要你繼續挺行這個世界或不同國家關於香港的故事，還有繼續聯繫不同的海外香港人，就算你是在香港開一個 Twitter 引起外國的注意，你都可以是一個國際戰線的參與者——是定義於你的行動和動機。



Source : Cloud

Q: 你覺得自己在打「國際戰線」嗎？你覺得現在做的事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N: 算是吧。（那你覺得國際戰線現在最應該如何有效地「打」？哪些做法會影響國際戰線的成效？）當挪威跟中國有什麼協議，互動的時候，我們希望讓當地人更小心地思考會有什麼影響和後果，例如自由貿易協定會不會被中國變成工具，達到其政治目的，令挪威在其他問題上噤聲，或變相支持壓迫維吾爾人等。希望我們現在做的事，可以避免像中挪簽署雙邊關係正常化聲明然後挪威噤聲的情況再出現；希望支持人權民主自由的國家能繼續積極發聲。

我認為國際戰線並不是一日見效，可能多年後才能看見影響。重點是連繫各地的香港人，把香港的語言、文化承傳下去——讓更多人記得和認識到香港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香港發生的事為什麼是這麼難接受。我們想告訴挪威人香港雖然沒有普選，但曾經像挪威一樣那麼自由，而這一切在很短時間內變了，所以他們現在享受的權利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S: 如要說，我可能是…… 卒仔？始終都是匿名的狀態參與，覺得自己未去到「國際戰線」那程度。唉，這個怎麼說呢——我沒視自己為國際戰線，我只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香港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包括香港的政治、文化、歷史。



Will: 我覺得我絕對是在打國際戰線——我們正在提醒日本政府，他們需要在香港的事務上做出一些回應、不同程度上的政治行為或策略。同時我們亦有促進文化交流，和日本的民眾以遊行、交流會等活動進行更深入的交流，推廣香港文化。從我角度來看，我們是在國際戰線上努力的一分子。

始終日本的情況跟其他國家不同，要有它獨特的方式去進行，有時候不能像英美一樣那麼快推出一些制裁和積極的政策。當然那也是我們倡議的終極目標——制裁、放寬移民政策等。我們預想（日本）未能夠承諾這些事情，會否可以打擦邊球，例如不能反中的話，透過人權框架去討論香港發生的事。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最重要的是保持香港與國際的資訊流通（例如國安法有多少案件、判了多少年），無論是網絡上、或各國的國會，不同層面上都需要。悲觀的說，香港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發生大型的抗爭活動，可是我們也不能預測未來——可能明年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也說不定。雖然可能處於很被動的狀態，我們只能繼續做，繼續告訴他們香港的人權問題，然後如果某天有重大發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整合一直以來的資訊，向日本國會議員表明，中國的情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個醞釀已久、真真正正需要處理的問題。


Source : sid-ali

英國「住家飯」計畫

Q: 可否簡介一下你們的行動？

陳：我們的行動是分享一些住家飯給不同的手足。我們以往在香港好鄰舍北區教會有一些經驗。當時在反送中的時候，因為社會撕裂，有些年輕人需要食物，我們用聖經教導的「給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的方式向他們分享食物。現在我們在英國，許多流亡的年輕人都是住在家長屋。其實很多時候都有好強烈的隔離感，例如中秋節，可能無法與家人過節。我們希望可以有食物的支援，同時以支援、關懷和互助的工作，和這些年輕人建立關係。我們首先做配對的工作，然後找願意做飯的義工，好像香港的Deliveroo那樣送過去。我們會按照年輕人的需要安排配對，同時也會關顧到情緒、健康等方面，形成一種「互為關顧」的關係。

F: 首先我們是用telegram聯絡，我們會用bot報名。這個設計是為了方便大家一開始不需要提供過多個人資料。我們只需要他們提供基本的居住區域，再以Google Map的postal code，看看我們如何組織到願意提供膳食的家長。當我們知道他們的性別、歲數、膳食提供的方式（外賣還是上門吃飯）之後，我們就會安排online interview，以更加了解他們，看看家長和吃飯的朋友是否合得來。

S: 這個目的是為了確保大家安全，避免混水摸魚的人。我們也會有一些檢查方法，也會問一些問題，來保障參與者都是有心參與的人。有這樣的安全機制，反而令參與者更安心。我自己在運動裏面都認識許多年輕人，大部分人都不是因為經濟困難所以來一同吃飯。許多時候，是因為寂寞，希望可以找到更多香港人互相聯繫。而就算是負責煮飯的參與者，也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方式認識更多香港人。

陳：昨天我在Bristol有一個祈禱會，當中我就詢問參與者是否有興趣參與「住家飯」計畫。祈禱會完畢之後，有幾個人來找我，都說希望可以聯繫到香港人。通常在我們的行動裏面，煮飯的人會比較多。而大家都希望可以組織一個安全網，幫助一些手足。有一些人可能是居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但都願意落手落腳幫忙。

Q: 這個行動本身有信仰背景，你們會如何思考信仰和行動之間的關係？

F: 大家其實也是人，在行動裏面，我們不會要求參與者必須有信仰。不過有些參與者可能在參與過程中，也會提出他們希望「返教會」。我們都會邀請他們參與聚會。

陳：其實基督教信仰有兩個主要的理解，就是福音和文化對話。我們覺得，耶穌在做門徒訓練和宣教也是與許多人吃飯。其實一些年輕人他們可能沒錢吃飯，但他們很難開口問。香港有四百個義工但英國這裡的scale非常不同。我們現在還是很努力地編織這個網絡。最重要是一些香港移民過來的人可以settle down，例如有車牌之類。而來英國的香港人都係很有心。他們的政見相似，也很有愛心。當我在倫敦舉辦集會的時候，我深深認同香港人真的不要有所謂的「山頭主義」。我們雖然有信仰背景，但我們集會的主辦單位直接叫「香港人」。

Q: 談到移民和settle down，你們的計畫會如何幫助他們融入到這個社會？

S: 有些參與吃飯的年輕人，他們是剛剛來到。他們融入這個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必須擺脫那種認為是自己一人在這裏的感覺。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依然有人默默支持他們，這才可以讓他們融入社會。

F: 其實時間是可以成為任何一個初到他鄉的人，撫平傷口的解藥。許多人因為剛剛來到，失去所有朋友，甚至有語言的困難。他們也要踏出自己的一步，去參與和認識香港人，這一步確實要自己走出去。我很開心有些參與者因為參與這個program而覺得「warm左」。一些手足在初期來到英國會遇到一些心理健康不理想的情況，而這個計畫在「食飯」的行動背後，其實代表著更多的關懷。

陳：我試過幫一個手足尋找一些地區教會的支援。這個手足有財政困難，不夠錢吃飯。然後接觸的教會有一個弟兄約了這個手足出來買飯菜。他說，因為他們本身不希望「派錢」，希望約這個手足出來一同買食物。但其實這個過程難免會出現一些尷尬的情況。因為雙方其實互不相識。然而，一些老華僑/香港人會覺得這些新來的香港人也必須努力適應這裡。有時候甚至會有一些既定印象，以為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只要努力找工作，甚至打黑工就可以。但他們不了解如果這些手足打黑工的話，只要有一個人向英國內政部通風報信，他們的申請就會泡湯。所以在要求他們努力返工之前，其實手足更需要的，是要settle好一些基本的日常生活。而我們觀察中可以看見，其實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想自力更生，但是錢不夠是個問題，例如他們搭車出倫敦參與集會，也是一筆車費。

當我們要談到民族認同和身分的時候，有些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會說，BNO holder其實難以明白他們面對的處境，因為大家擁有的權利、資源和身處的處境都非常地不同。大部分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都是寄人籬下，而且缺乏資源。



Source : ben-collins

Q: 你們的行動本身是一種社會關懷，「政治」和「國際戰線」對你們來說有多大的意義？

S: 其實經歷了那麼多，政治是融入在生活裡面。我們很難撇開哪一個部分是政治、哪一個部分是生活，因為兩者都處於同一個時代背景。

F: 很多人會跟我說，你的教會「都幾黃吓」，但其實我不會怎麼回應，因為許多時候這些人都是在批評教會不應該參與政治。

陳 :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單純從「社會服務」的進路去思考這個行動。「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這些都是透過行動來達到政治訴求。因此，當我們關注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我們也會關心一些倡議的工作。同時，我們要融入社區，不單單是要學會講英語，我們也需要做更多關顧孤寡貧弱的聚會。例如推動一些不同國家的難民一同聚會和吃飯，讓不同人講講他們面對的問題。例如可以問問那些「脫北者」如何思考光復北韓，還是許多人都已經放棄光復北韓等等。

S: 對我來說，現在所謂的「國際戰線」，是要思考作為流散者，我們如何走下去。我們是要守護自己的文化、重新適應這個地方，還是要如何？既然我們已經身處海外，不要忘記自己經歷過的歷史，並且要採取行動來聯繫不同「共同歷史」的人。當我們能夠connect到不同的人，學習不同國家流散者的做事方法，其實我們也在裝備自己。



F: 我永遠都覺得我們是來自香港，這點我們不可能會忘記。我自己的心態是覺得，這和社運的時候一樣，只要繼續做就可以。當時陳傳道在教會問有沒有人可以幫忙。我就答應了。其實在過程中，我自己會很強烈地感受到我的一個「香港心」，我自己也強化了自己的身分。我覺得大家在另一個國家，如果真的組織到自己的社區、如果真的能夠保留到自己的文化，甚至教育下一代到底香港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香港人的精神就可以保留下去。

R: 沒有錯，國際線就是要保留香港人的精神。

F: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心底有沒有一個對未來的希望，雖然我自己比較悲觀，但希望種子不會熄滅。不過，我現在能夠做到的，就是積極面對的態度，尋找自己的方向。當中不會放下香港人的身分。其實積極生活下去就已經是一種「只能夠 work for the best」的生存方式。

陳 : 我自己對未來是有一個盼望。因為參與過「住家飯」的朋友都經歷過，當最困難的時候有人和他們同行過。這是一份愛的力量，讓人知道受苦的時候，有人和他們同行。

S: 以前許多時候，都會思考將來還有多少機會去實現心裡面希望的未來。但現在我不再思考了，因為思考也沒有用，只能繼續朝著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


Source : tomé-louro

鬥長命的「國際戰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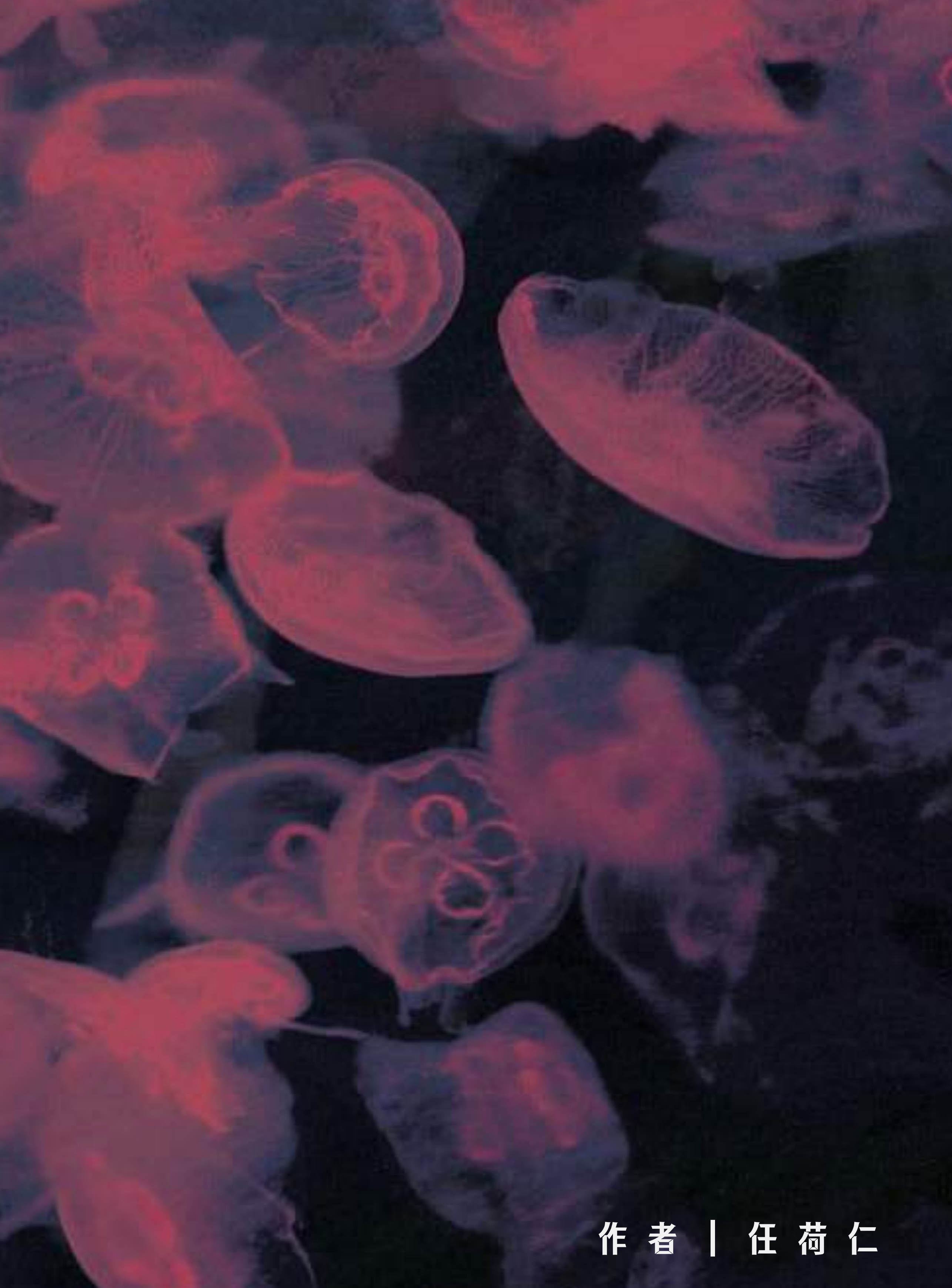
突然死亡，不必然是痛苦的。也許日復一日的凌遲處死，才是讓人最心痛的。在面對香港人的社會環境不斷地轉向極權化，不少香港人每一天都好像看著似曾相識的故鄉不斷地被改變。在這個時代的背景之下，有些人選擇繼續留守家園，見證威權時代的降臨；有些人選擇遠走他鄉，在別國建立自己的家園。不論是何等的選擇，不少香港人都會認同，在這個時刻，香港人更需要鞏固自身的群體性，並尋找一種方式可以讓這個群體繼續延續下去。

從這三段訪談可以看出，「國際戰線」這四個字的意義已經慢慢轉變成一種長期且延續的抵抗。這種抵抗的過程，可以是一種文化性的抗爭，透過不斷保留自身香港人的文化，讓下一代和更多不同國家的人認識香港文化。這也可以是一種政治性的抗爭，透過游說工作等不同方式，試圖透過國際政治的漩渦尋找出路。這也可以是一種「互相關懷」的聯繫，透過鞏固具有相同經歷的香港人，甚至與其他國家流散者的關係，組織出一種軟性的反抗共同體。這一種「國際戰線」並不局限於那些身處世界強權的香港人才能參與。在小國寡民的國度裡，文化承傳、流散者的聯繫和政治性的集會依然可以繼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發生。這種意義並不拘泥於人數參與的多少，而是參與的人都有著一樣的信念繼續行動。

讀者投稿

皮靴

警笛飆過，粉碎德州木屋
硝煙四起，我又回到尖東
海水味，瓦斯味，汗水淹沒
交通燈，吶喊聲，心跳抛離
手機顫動，83個未讀信息
紅隧失守。漆咸道封咗。我出黎接你。
有狗，清真寺，聖安德烈堂，人民大道中
皮靴！在轉角，逃不了
Sir, your ribeye, medium rare.


作者 | 任荷仁



書評

拜登政府如何處置美中貿易戰？：《大國攤牌》提供的幾點參照

Superpower Showdown



作者 | 陳為廷



Source : William_Isaac_Thomas照片_Wiki

這個十月初的美中關係發展詭譎。

習近平循往例恫嚇台灣，中國派戰機擾台創單日新高架次，而美國高聲回擊；同一週，美國貿易代表（USTR）Katherine Tai發表拜登政府對中貿易政策，隨後與中國代表劉鶴會談，Jake Sullivan與楊潔篪也在同一週敲定拜習將於年底前對談。

Katherine Tai這份政策Review原是眾所期盼，但結果仍是令人霧裡看花：雖暫不撤回關稅，但也暫不執行協議、暫不發動針對中國產業補貼的新調查，一切等雙方會談後再做決定。美中在 2020 年 1 月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該協議在 2021 年底就要到期，屆時美方勢必要有後續行動。結果究竟如何？答案恐怕要在年底拜習對談前才會揭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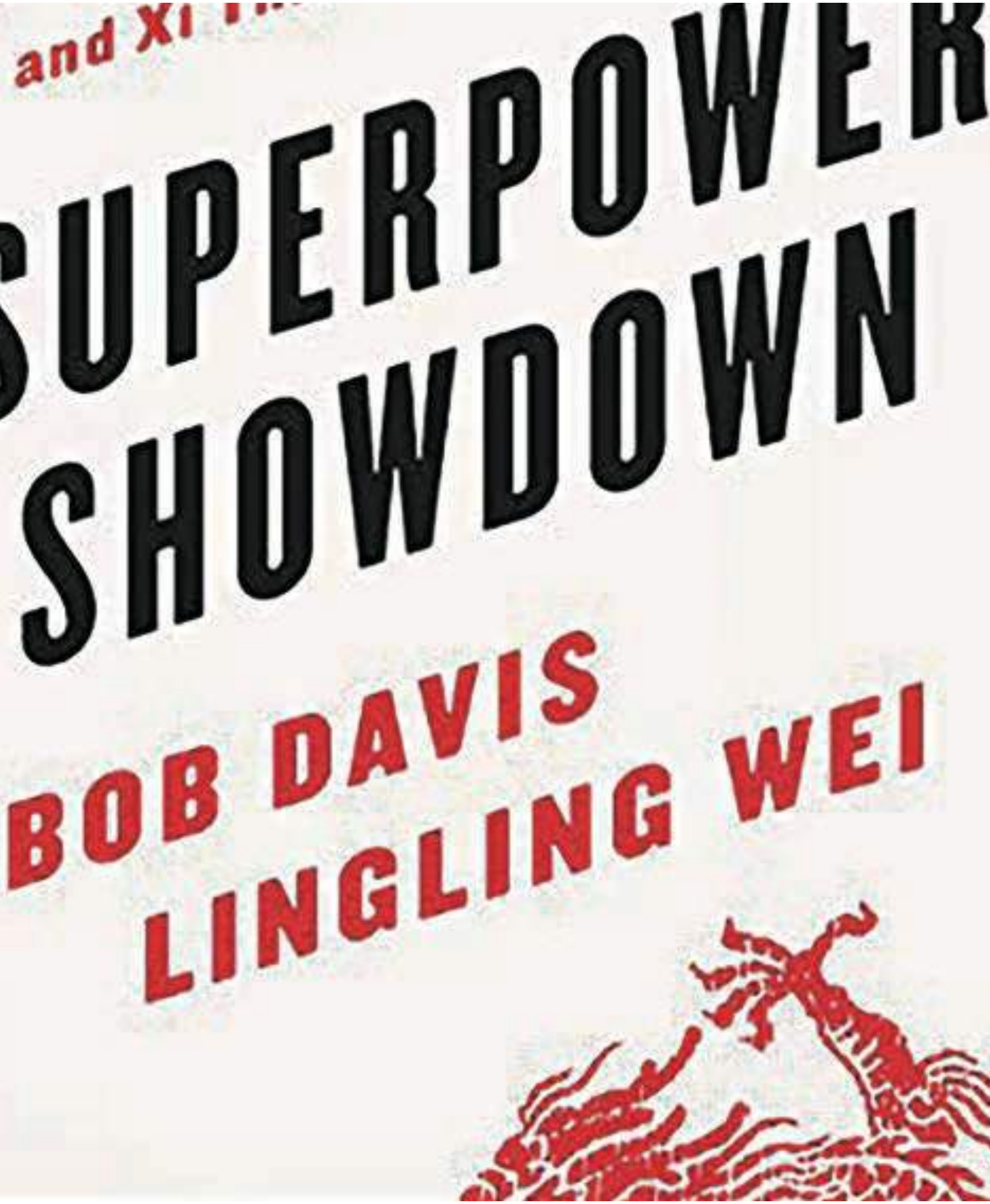
在那之前，若想初步理解美中貿易談判基本議題，《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仍是非常好的參照。本書出版於 2020 年 6 月，作者是兩位《華爾街日報》的資深記者：Bob Davis駐DC，從 1990 年代親身採訪美中貿易談判至今，Lingling Wei原駐北京，但在 2020 年遭驅逐出境。作者採訪功力深厚，本書堪稱是至今最能完整描述貿易戰原委的著作。要觀察拜登政府後續動作，本書也能提供幾個參照方向：

一、貿易政策與國安、人權政策的連動

本書開篇就是從 1993-1994、以及 1999-2000 的兩場「美中貿易政策大辯論」談起，描述柯林頓政府是如何從起初主張將人權條款與對中貿易掛鉤，到後來迫於來自美國的企業壓力而棄守，再徹底轉向支持中國加入WTO，主張以「Engagement（接觸政策）」促進中國民主化。二十年後，這樣的「接觸政策」被證實失敗，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威脅，也促成川普崛起。但川普時代的對中貿易、人權政策，也持續拉扯：2017 年初期，川普政府其實只談貿易而少談人權，到 2018 年初重整內閣後才對中全面開戰，再到 2020 年 1 月美中簽訂貿易協議後，貿易鷹派卻反過來壓制人權策略。反觀拜登政府，比起幾乎不談人權的前任USTR，如今Katherine Tai則是將新疆強迫勞動議題納入貿易談判核心，這樣的立場在後續談判中會佔據什麼位置？值得觀察。



Source : MarkusSpiske_on_unsplash



Source : SuperpowerShowdown

二、貿易戰政策目標多元，須細緻檢視成效

貿易戰到底有沒有效？三年過去，仍是眾說紛紜。主因是其政策目標多元，且短期內都難以定論成果。貿易戰初期，外界只注意到川普個人喊出的「貿易赤字」與「將產業鏈遷回美國」；後期，各家智庫則主要檢視中方未能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內的採購承諾，以此證成貿易戰的失敗。

但本書解釋，其政策目標至少還包括：終止中國的強制技術轉移政策、終止產業補貼、開放市場，以及科技戰的維護國家安全。Katherine Tai在本月演說中提到，「中國已經在部分承諾上做出改善，但部分沒有」，但絲毫不提細節，因為一旦「蓋棺論定」，拜登政府也就有立即的壓力要升高或緩和行動。未來幾個月，我們還需密切觀察拜登政府如何定調這些「戰果」與「未經之功」，才能判對後續動向。



Source : KarolinaGrabowska_on_pexels

三、美國政府內部的路線爭辯影響貿易戰走向

本書最有意思的是，透過記者的採訪功力，我們也能試圖一窺政府內部的政策辯論（當然我們無從完全確認消息真偽，還必須比對公開發言與政策來加以判斷）。川普時代，在貿易戰初期，USTR、國安顧問、國務院、商務部一路抱持鷹派立場，惟主管制裁的財政部一路踩煞車；而最戲劇化的轉折則是在 2020 年中後期，當國安外交系統企圖進行台美FTA談判、升高對香港新疆的制裁時，USTR為了確保貿易協定能被執行，卻化身最大鴿派，力阻相關政策，且由於川普政府將該協議視為重要政績，一路到大選前，USTR的立場似乎頗能與國務院、國安會相抗衡。



反觀拜登時代，Blinken、Sullivan兩位老臣主導的外交國安體系，似乎較能掌握對中政策的主導權。但近幾個月來，也迭有報導傳出USTR與歐巴馬時代就力推TPP的「亞洲沙皇」Kurt Campbell針對是否重返CPTPP有立場衝突；財政部長Yellen則在九月首度公開受訪，直言貿易戰傷害美國人民。整體而言，拜登政府的施政要務仍是「Build Back Better」，強化國內投資，且在相關法案預算到位前先擱置貿易談判。因此在Katherine Tai演說時，即便明知中國已在為申請加入CPTPP、杯葛台灣而加足馬力遊說各國，面對現場提問，她還是不改先前立場，主張美國仍不急於重返。

當然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中抗衡的框架仍未改變，但未來兩個月的科技、貿易談判，仍可能大幅影響未來數年的美中關係走向。入冬之前，本書必為鑑往知來的最佳讀物。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1 DEC　Vol. 4「國際線 International Front ● 」

編輯委員會	周永康、黃台仰、張崑陽、梁繼平、鄺頌晴、江旻諺、鍾燊豪、馮仔、千八女鬼、式、言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譚競嫦
總編輯	張崑陽
美術設計	Mido筑、馮詔天Sky
校對	Justin、Charlie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8號9樓之一 電話 (02) 2395-2552　傳真 (02) 2369-0318 電子信箱 edu.flowhk@edunion.org.tw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初版一刷
售價	新台幣 450 元 ／台灣 新台幣 600 元 ／台灣以外地區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支持台灣獨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在台港人組織－香港邊城青年執行委員。
身在異鄉，心繫我城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水雜誌 Flow HK》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lowhkmagazine
經濟民主連合官方網站　http://www.edunion.org.tw/
經濟民主連合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duniontaiwan/

Vol. 4

2021 DEC



「面對前所未有的歷史試煉，流散於各方的我們決心
要維繫香港人這個獨特的共同體，承傳抗爭的火種」

——《如水》創刊宣言

台灣 | 新台幣 450 元　台灣以外地區 | 新台幣 600 元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出版發行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98612-7-4

9 789869 86127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